

REMEMBRANCE

記憶

DOMESTIC EDITION

国内版

Aperiodic Publication

不定期出刊

追忆似水年华
汇聚天下文章
建立交流平台



《记忆》338期

【思想文化】

- 2 王若水批评《讲话》中错误的人性观
- 4 曾彦修：资本主义是消灭不了的——致何方信

【百年国史】

- 6 山西文革史·导言/石名岗（遗作）
- 19 绘本特殊年代——漫笔文革岁月（1966--1976）（九）/墨娃

【书讯】

- 27 旅澳作家/画家刘海鸥《画说我的一生》在美国华忆出版
- 30 湘人书坊出品《邓克生补编四种》
- 34 张宁静收集整理《榆次文革回忆》（续）自印出书
- 40 王晓林著《薛明剑、孙治方兄弟》由美国博登书屋再版

【评论】

- 41 “爷爷，爸爸不是共产党”
——海鸥《画说我的一生》读后/老方
- 56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评《忠奸人》/一清
- 68 “状告海关案”跟进报道（79）/李南央（美）

【序跋】

- 71 师大女附中《教育叙事》无序之序/王本中（主编）
- 74 《教育叙事》自序
- 78 《教育叙事》后记
- 79 《风起莲月》作者后记——2014：虐心的写作/冯敬兰

【资料】

- 81 清华大学文革资料选登
关于对团派和414双方分歧的调查报告（1968.4.1）

【思想文化】

编者按：我一直认为，在中国百年思想史上，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思想成果最值得学习，对当下的中国最有现实意义。八九十年代一批人，主要指的是“两头真”老人。他们用一生的磨难留下的文字，思想含量高，针对性强，没有宏大叙事，没有西方的新名词，接地气，见真谛，虽有局限，但是他们亲身的体会和深刻的观察，使他们对马列的思想体系、现行制度、党文化、潜规则等有切实到位的分析。因此，其思想成果值得我们反复温习，深入探讨。

在这些思想启蒙家之中，王若水是理论上造诣最高，所谈的问题最有针对性，他对是中国观察和剖析最深刻，最有启发性。我曾经有幸与王先生一起在北欧访问，但那时，我急于写自己的书，没有机会向王先生讨教。当时，我也没有认识到王先生的意义和作用。直到新世纪，在思考当代国史、红色文化的过程中，我才越来越意识到王先生的重要性，遂在《记忆》的思想文化专栏，有计划地刊发王若水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10期），《“歌颂”与“暴露”》（295期），《重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332期），《毛泽东的“斗争哲学”》（1-5）（333-337期）

本期介绍王若水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党文化”的纲领》的大致内容：

王若水批评《讲话》中错误的人性观

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 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 二、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
- 三、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还是应写黑暗。

毛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是：

- 一、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
- 二、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不能去表现普遍的人性；
- 三、今天的文艺应写光明，歌颂工农兵。

王若水认为，这三条原则都是与启蒙精神对立的。我要加上一句，这三条原则也都是为专制主义服务的。它们给中国带来了大灾难，它们今天虽然阶级斗争不提了，普遍人性可以表现了，知识分子可以歌颂了，但文化为政治服务，文化必须表现光明，至今仍旧在肆虐。毛时代有歌颂性喜剧，有歌颂性相声，歌颂性散文。后毛时代有《苦恋》被批，有《蓝风筝》《活着》《鬼子来了》《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软埋》等艺术作品被禁。毛时代不准批评，后毛时代还是不准。

“毛泽东说，要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政治服务，实际上是为共产党的政治服务。笔者以为，这种政治即便得到人民的拥护，也不能说一定是百分之百正确的，更不能说这种政治就不可评论、不受质疑、不需要实践检验。”“政治家就得以对艺术家指手画脚、横加干涉，“应当写这个、不应当写那个”，“应当这样写、不应当那样写。”

为党服务，就是党管文艺，党连文艺都能管，还有什么不能管的吗？为党服务，也是为领袖服务。三忠于四无限，毛崇拜和党崇拜《讲话》厥功甚伟。“欧洲中世纪的教会把哲学当作神学的婢女，列宁和毛泽东则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婢女。”充当政治婢女的何止区区文艺，整个中国文化又在侍奉着一个主子。

关于人性论，王若水指出，毛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这个说法至少有两个错误。第一，“毛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时，把普遍的人性也否定了，又把具体的人性等同于阶级性。”第二，“说人性中没有超阶级的爱也是不对的。超阶级的爱情是存在的，超阶级的民族性也同样存在。……贾府的焦大固然不爱林妹妹，宝二爷和晴雯之间还是很缠绵的；而《雷雨》中的周家大少爷和小少爷都爱上了丫头四凤。”

王若水认为：只承认阶级性，把阶级对立绝对化，这就一方面否认了共同的人性，另一方面也否认了人的个性。到了文革开始时的“五一六通知”发表时，上述否认共同的人性的观念就进一步发展到公然否认人人平等（宣称“无产阶级”和所谓的“资产阶级”之间没有平等可言，无产阶级就是要压迫资产阶级），从而掀起了对“自由”“平等”观念和人道主义的批判。

王若水说：所谓“歌颂”还是“暴露”的争论之实质，就是允许不允许批评、有没有言论自由的问题。毛清楚地表示，他是鼓励歌颂而不欢迎暴露（批评）的，

“对于人民，这个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该歌颂呢？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你是资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艺术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二者必居其一。”他用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好像所有艺术家不是“资产阶级”的就是“无产阶级”的。那么，有没有农民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呢？是不是对所有的作家都要按阶级来定性呢？难道作家除了歌颂之外写的就必然是暴露性的东西，那么有没有既歌颂又暴露、既不是歌颂也不是暴露的作品呢？其实，资产阶级作家也不一定只歌颂资产阶级而不歌颂无产阶级。十九世纪欧洲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就是批判资产阶级的。美国记者斯诺写了著名的《西行漫记》，歌颂了中共和边区。

“毛泽东把“无产阶级的人性”定义为“大公无私”、“最有远见”等，似乎一切革命的美德无不具备。后来，中国的文艺作品中就应声而出现了样板戏里那种“高、大、全”的英雄人物。这是理想化的无产阶级，并非现实中的无产阶级。”

这么明显的理论错误，在中国横行半个世纪，一是禁止讨论，封杀思考。二是中共高层理论水平太低，没能认识到《讲话》的错误，因此更谈不上纠正。❏

【思想文化】

曾彦修：资本主义是消灭不了的

——致何方信

历史证明，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远未成熟，已经先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基本上都是失败的；而资本主义倒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它的历史使命当可再持续百年以上。少数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得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就很难维持下去。而所谓改革，其实就是放弃一些原先自认为的社会主义特征，再自觉地退回到资本主义去，如放弃消灭私有制，放弃计划经济，恢复市场经济等。

刘少奇的《修养》《党内斗争》，主要是强调必须消灭个性，人人都必须成为“驯服工具”的教科书，尤其是《修养》，没有起好作用，只要人成为工具，而不要人有思想，是启蒙主义的尖锐对立面。此文的消极作用至今在一些同志头脑中仍占统治地位，我们建的是苏式党，

——曾彦修 2002年8月31日来信

其实，“实事求是”是常识，中外自古有之，本与马克思主义无大关系。现在忽然上升成为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稀有的宝物了，正好说明不实事求是，是久已成风习了，这才显出了实事求是的珍贵。

——曾彦修 2003年3月30日来信

胡乔木、邓力群二人就是在1982年十二大后取得紧握党中央宣传最高控制权力的最严厉和最严密的司令官。从来都是内行整内行最为厉害可怕。

——曾彦修 2004年7月13日来信

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对于自己被某个人君格外施恩选拔重用，即所谓人主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坚持人民本位到底的立场，这叫“曾经圣人手，字字变黄金”，并不是那么正确的。

胡乔木甚追求（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均酸气十足，文理不通，不是味道。总像些高中生或大一学生替他拼凑似的。而且文气酸腐，语体文不通。什么叫“权为民所用”？狗屁！比清末新政说还酸腐。这种权是神授的！

胡乔木、毛思想一致问题。我觉得胡受到的教育，使他不大可能同毛思想一致。胡究竟是个书生，本来深受民主与自由主义影响。田家英和我二人在其领导下编语文教科书一年，深知胡极佩服俞平伯、朱自清、闻一多等。胡因是秉笔太监，再加上毛拔胡于诸文人之首，胡“于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驰驱”。我看胡基本上是个二重人格与利害问题。他自己已上了神坛，下不来了。（软骨头是本质）

胡陆（定一）关系问题：据于光远较详地告知我，进城后一直是胡领导陆。于云，有一次陆不在场，胡对几个人说，“可叫陆当北大校长去”，即公开表示胡可分配陆的工作了。此项权力，当然来自毛处。”

拿日丹诺夫与胡乔木做比较，难说得很。日公一直抓一市一区的全面工作，他还在军事委员会中代表斯大林、党中央……在文化思想理论中，则其位远在少奇之上。《莫洛托夫访谈录》也盛赞日氏自学努力，学问好。但日公的文化基础知识比胡似差得远。从日的著作看，他的知识面比胡也差得远。日确有一样是内行，即音乐与音乐史。这是他的强项，所以做了两次报告。他骂文艺界名人时，就成泼妇骂街，有失体统了。❏

——曾彦修读《党史笔记》党史编纂学一章后来信

【百年国史】

山西文革史 · 导言

石名岗（遗作）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山西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兹将人文地理、前文革干部状态、“四清”的影响，山西文革的阶段、机构、组织及主要人物等方面的情况，做一概况性的介绍。

一、人文地理

山西，简称“晋”，面积近十六万平方公里，位于华北西部，北京西南，毗邻冀豫陕蒙四省、区，是连接西北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台阶。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山西省的行政区划为五专三市，即晋中、忻县、雁北、晋南、晋东南专区，太原、大同、长治市。人口约一千七百万。

从人文上讲，山西是早期人类活动的场所。晋南临汾襄汾一带的古丁村文化遗址可以追溯到十万年前旧石器时期的人类活动。山西还可以追踪从伏羲到尧、舜、禹活动的传说，襄汾陶寺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的国家雏形。可以说，山西是中华古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孕育中华民族的摇篮。

近三千年来，山西在中华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过程中产生出了不少的将相文人。名相如张仪、狄仁杰、裴度、司马光等；名将如卫青、霍去病、关羽、薛仁贵等；文人如白居易、柳宗元、王维、王昌龄、王之涣等。值得一提的是，近体诗所通用的“平水韵”就出自山西临汾，显示了山西的文化底蕴。

从地理上讲，山西素有“表里山河”的称呼。表里山河者，外河而内山，地势险峻。一条大河（黄河）从西面（北向南）把山西与陕西、内蒙分开，成为山西抵御西北游牧民族入侵的天然护河；一座大山（太行）从东面把山西与河北、河南隔开，成为巩固山西东面的天然屏障。山西的东部是绵延千里的太行山，山西的西部是八百里吕梁山脉。汾河在两山之间流过，山间盆地和汾河河谷成为人类聚集的地方。从南到北有晋南盆地、晋中盆地、忻定盆地及晋东南的上党盆地。山西的河浇灌这里的麦棉谷黍，山西的山蕴藏着丰富的煤铁铝铜，使山西具备了自立自主的条件。

在这样的人文地理条件下，孕育出了独特的晋文明和晋文化。悠久的人文历史和表里山河使山西人具有了开放和独立两种性格。说山西人具有进取开放的性格，是因为山西是古文明的发源地；说山西人具有独立自主的性格，是因为表里山河的地理。

表里山河可以作为割据的根据。然后积蓄力量，冲击中原，是很多政治军事强人的目标。山西人不甘于缩在山西，或者盘踞山西的强者，居高临下，有着进击豫冀的有利条件。早在春秋时代，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文公重耳）在晋楚城濮之战前有疑，狐偃解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意思是依山西的地形胜可进，不胜可守，没有什么损失。城濮地处山东鄆城西南，距晋地大约千里，晋军在此与楚作战，显然是为了争霸天下。此战之后，晋文公终成春秋五霸之一。从唐到五代，至少有三个王朝出自山西。

另外，历史上中原地带战争不计其数，由于表里山河的保护，山西人损失相对较少，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向外移民，最著名最大的一次是明代向外移民，由于移民集中在洪洞县分批统一出发，象征洪洞县的大槐树就成为外地山西移民后裔祖籍的标记。

山西西北部历来是抵御异族入侵的前线，但又是连接各民族交流的纽带。近几百年来崛起的晋商活动范围遍布蒙（古）绥（远）热（河）察（哈尔），甚至远达俄罗斯，大量的山西人“走西口”，移民内蒙及张家口，至今内蒙呼市、包头的语言与晋语大同小异。晋商在活动中还创造了银行的雏形“票号”文化。

在近现代，山西人独立而开放的性格体现得淋漓尽致。1911年10月29日，山西在中国北部北洋体系控制中脱颖而出，是中国北部最先响应辛亥革命宣布独立的省份。

以后几十年间，山西的治理和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钢铁、煤炭、机械、纺织、铁路、兵工……都已自成体系。其基层组织（不同于国民党的同志会）和村民组织也别具一格，被誉为民国“模范省”。以至于在“蒋冯阎”大战时，在1930年在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冯（玉祥）讨蒋大战时，山西的阎锡山被推为“国民政府主席，陆海空军总司令”。可见，山西当时地位之重之特殊。但是，不知什么原因，或是独立个性，或是费用不足，拟或是山区特点，

山西的铁路是一米窄轨，常被外省人嘲笑保守。

到抗战，表里山河的地位特殊。黄河反过来成为西部防御的屏障，表里山河成为游击战场。八路军列于二战区序列，先在山西抗战。在北太行，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建立了晋察冀根据地、在南太行八路军总部与一二九师建立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在吕梁八路军一二零师建立了晋绥根据地。八路军以山西为跳板，又伸入到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北、河南、山东、苏北……形成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大局面。山西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

在八路军在贫穷的山里建立根据地时后，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进山参加抗日，同时也打开了山里人的眼界。他们一是懂得了抗战的大道理，二是知道了马列主义关于贫与富的大道理。当这些道理与贫穷相结合时，就造就了一个红色的山西。

二、山西干部队伍的形成与特点

鉴于表里山河的特点，在抗战时期，山西形成了三大战略区（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由于铁路公路及地势的不同，每个战略区又分为若干二级军区，如晋冀鲁豫就分为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区。以山头为根据地，与敌周旋，有其优势，但也容易形成独立排外的宗派及山头。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随着战争的胜利，新区需要大量干部，以建立地方政权，而山西作为老区正是贡献大量干部的地方。其中，晋绥干部随一野到西北；晋冀鲁豫干部随二野到云贵川；由晋察冀与晋冀鲁豫干部合并成的华北人民政府，则在进京后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华北局。另外，还有许多晋冀鲁豫及晋察冀干部随华北野战军十八兵团入川，太行太岳干部组成长江支队接管福建。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山西干部、群众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形容干部分布情况：太行的干部太岳的党，晋察冀的干部靠边站，晋绥的干部歇凉凉。意思是山西省级部门太行干部占据了干部的多数，太岳干部占据了党的领导地位，晋察冀和晋绥干部不太受重用，这说明了各个山头在山西的地位。事实也是如此，如文革前十年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的陶鲁笏、卫恒、王谦都是太行太岳干部，省委书记处也多为太行太岳干部。

在各战略区的大量优秀干部南下、西去、北上之后，自然本地的治理就是山西干部自己的事情了。山西各地人口、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省城太原

接管贡献干部的数量和质量也大不一样。由于自然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山西西北部的人口，经济、文化的发展显然不如中东南部。太原是由十八兵团发起，后抽调十九、二十兵团解放的，这三个兵团均属于华北军区，尤其是十八兵团，本就是太岳太行地方部队组建的。十八兵团由南向北，进行了临汾、晋中战役，最终包围太原。期间带来大量太行太岳干部，集中在榆次、平遥、孟县一带，准备筹集省市两级班子，这就形成山西太行太岳干部占优势的自然局面。从另一方面讲，也说明了原晋绥、晋察冀主要兵力和干部集中于外线，对本省的贡献相对较小。

留晋干部大多数是抗战前夕或抗战时参加革命的，本人多为农村小知识分子成分。这部分干部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在学生时期接受了初级的马克思主义及阶级斗争学说，充满革命热情，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基层的骨干力量，土改政策的具体执行者；二是他们多数属于间接接受马克思主义，读原著很少，思想意识还停留在“贫富”层面，尤其是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整体及自身的发展过程，不了解辩证唯物论的本质，不了解完备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充要条件。

从思想上讲，山西这些干部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把失败的苏联模式当作样板，简单地教条式地把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划上了等号，否定社会发展的“自然性”和阶段性。从理论上讲，他们从农民角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社会主义变成空想。这种思想理论认识，极易产生了“极左”倾向及“极左”路线。山西干部的这种思维模式对政策和全国产生巨大影响至少有两件事：一件事是1952年，山西省委呈报中央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推动全国过早实行农业合作化；另一件事是山西省委对大寨的推崇。

但是，出身太行太岳的干部，在中央和华北局是有靠山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中组部长安子文、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及刚刚调京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的原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笏都是太行太岳的老领导。如果加上山西人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的照顾，基本凑成文革初期被打倒“彭薄安陶”，这也是文革山西省委第一个被“夺权”的重要原因。

这就形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本来左的山西省委，在文革中被当作“右”的走资派群被打倒，成为全国第一个被夺权的省份。但文革中期省委主要干部被“解放”后执行左的路线也是回归其本来的思维模式。

当然，山西还有一些外来干部。这些被调到或贬职到山西的外来干部有一些大人物。其中有因地方民族主义问题被贬山西任副省长的原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刘格平（三级，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有省委常委、副省长（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刘贯一（五级），有贬到任副省长的原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有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袁振（六级，原鞍钢总经理）。从资历、能力、素质上讲，这些人至少不低于山西省委的主要领导。这也为后来的夺权埋下了伏笔。

三、“四清”对山西文革的影响

“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生在1963年5月至1966年5月，时处文革的前夜。其实，“四清”运动与文革连接在一起的，文革发动时，许多地方的“四清”工作组和参加“四清”的大专院校学生还在农村的“四清”岗位上。因此“四清”运动就不可避免地对文革产生了巨大影响。1963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发表后，山西省立即部署在祁县搞“四清”试点工作。1963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公布，省委在洪洞、长子、阳高、文水、祁县、原平、定襄、五台八个重点县开展“四清”运动，山西省委社教总指挥部设在洪洞县城牛站街（1965年五月搬回太原省委机关，改称省委“四清”办公室），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亲自挂帅在第一线指挥，同时陶鲁笱在洪洞县马牧公社南段大队蹲点搞“四清”。1964年山西农村的“四清”运动全部铺开。1965年初，中央公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山西城市的重点企业也开始了“四清”（也称作“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

1964年9月到10月间，在晋中地区的“四清”中弄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晋中乃至山西文革的大事件。后来在文革中被称作“十月事件”。该事件的三个主角分别是任井夫（晋中地委委员，行署副专员，曾任平遥县委书记）、王振国（晋中地委委员、地委副秘书长）、张怀英（文水县委书记），文革中被简称“任王张”。事件还涉及一个大人物，这就是时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

事情应该从大寨所在地昔阳县说起。

1961年，山西省及晋中地区对昔阳县的领导作出了调整。担任县委书记多年的张怀英被调出昔阳，到文水县任县委书记。原孟县县委书记张润槐接任昔阳县委书记。张润槐上任之时，正值全国纠大跃进之偏，反对“五风”（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生活特殊化风）的时候。新县委书记张润槐，“纠”过去工作中的偏，反“五风”，是其分内的事，也许这是调整县委书记的缘由。这当然会得罪原县委及基层一大批干部。再者，山西人本就有点排外，而老区人更是多少都有“山头主义”倾向，在战争年代，昔阳属晋冀鲁豫的太行区，孟县在正太路以北，属晋察冀的冀晋区，昔阳人对张润槐有着自然的“排斥”心理。还有，张润槐文化不高，做事认真，但工作方法简单，说话常“放炮”，与文化较高的张怀英形成鲜明对比。基于以上原因，久而久之在昔阳县委和县政府的干部里有了一定数量的反对者。

要命的是，刚来的张润槐与影响很大的全国劳模陈永贵产生了嫌隙。张润槐职务虽然比陈永贵高了两个档次，但陈永贵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却比张润槐高得多的多。在性格上，陈永贵是久经事故的老狐狸，张润槐是个“二杆子”，况且他们的分歧涉及党或国家层面的政策和路线问题，他们之间是巨人与矮子的斗争。从这个意义讲，后来张润槐的失败是必然的。

概括起来说，陈永贵与张润槐的分歧可以归结为三点：

其一，大寨的土地问题。

张润槐上任七天就到大寨搞“小三查”，在当年开展的反“五风”过程中，张润槐曾带过几个人到大寨查土地、产量是否实在，查有没有搞浮夸。

大寨一向重视农田基本建设，过程中造了一些新田，按惯例大寨在上报平均亩产量时未把新田计算在内，理论上相当于于“虚报”了产量。张润槐要求陈永贵必须把新田计算在内，这样一来，大寨的亩产量就从六百多斤降到了五百多斤，这使陈永贵觉得张润槐是故意刁难。

其二，对昔阳大跃进的看法。

张润槐对大跃进的态度，更使陈永贵和昔阳县的许多干部大为不满。张润槐上任后调查昔阳大跃进中的问题，调查的结论说：大跃进搞得民不聊生，社员有六大不自由，八大对抗，基层干部有四十七种刑法，大跃进中某些干部比国民党、日本人还要坏。这一骂，骂到谁的头上呢？昔阳大跃进的虚火早已熄灭了，但大

跃进中办过错事的昔阳各级干部都还在，陈永贵便公然反击了，说：“1958年以来成绩是主要的。老张把昔阳成绩和缺点颠倒啦。”

其三，对“三自一包”的看法。

陈永贵与张润槐的根本分歧，还是在执行当时农村工作的方针政策上。张润槐上任时，昔阳正闹饥荒。他到安坪大队搞调查，发现这里的小块地开得很红火。社员们在安坪河的大荒滩上开出一块块私人小片地，种了庄稼蔬菜。有一位老汉开了三分荒地，种一分麦二分菜，解决了自己的口粮问题。张润槐十分兴奋，也顾不上回县，在安坪公社开了一次现场电话会议，要求各公社推广那位老汉开小块地的经验，他号召社员们每户要种一分麦二分菜。一个老汉闹单干，开小块地倒成了先进典型？陈永贵感到愤怒！

1963年，昔阳县领导层内的矛盾终于暴发。导火索是县党代会的选举。

9月25日，中共昔阳县第五届党代会召开。在选举县委领导人员时，一些对张润槐不满的人私下串联，不投张润槐的票。选举结果张润槐虽然当选，却少得20多票。在当时却是了不得的“重大政治性事件”！张润槐将选举结果上报晋中地委后，地委书记等大为恼火，说：“共产党不选共产党，这不是反党吗？”随即派人到昔阳来调查。

1964年9月，在“四清”运动中，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将昔阳定为“四清”运动重点县，决心利用这个时机查查昔阳县委的问题。1964年9月26日，晋中地委召开扩大会议解决昔阳县的“宗派活动问题”。昔阳县委常委们参加了这次会议。陈永贵当时只是县委候补委员，但他已是全国有名的劳模，又与此事有不少关系，便也被扩大了进来。

这次晋中地委扩大会议，连开了40多天，气氛颇为紧张，形成了舆论一边倒，批判以张怀英为首的昔阳反对张润槐的那些人，并给他们戴上了“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的帽子。中共晋中地委一位副书记训斥张怀英：“你们不就是仗一个陈永贵吗？陈永贵有什么了不起？亩产500斤的村在全国有的是，多如牛毛！你们想抱这个粗腿？抱不上！”通过这次地委扩大会议，给“昔阳县反党宗派活动”定了案。全案涉及300多人，张怀英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28名在昔阳的县委、县人委中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被调离昔阳。另外，任井夫、王振国因给上级写信反映地委书记的问题，得罪了新任地委书记，在会上也受到批判。六四年

九月晋中地委开了四十多天扩大会议，定为任王张反党集团（后定性为宗派集团）。会议免去了任王张的职务，其中，任井夫还有“生活作风”，据说在平遥任职时，男女关系方面很不检点，为此被判在忻州劳改砖厂进行劳改。这事发生在1964年10月，故后来称为“十月事件”。

10月，由中央、省、地、县机关抽调的6000余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赴祁县、昔阳开展“四清”大会战。以晋中地委副书记卜虹云为团长、副书记兼秘书长苗枫为副团长的“四清”工作团进驻昔阳，苗枫亲自抓了大寨的“四清”。

12月，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起到了保护陈永贵和大寨的作用，尽管工作组扎根串连、丈量土地、挑剔“扫雪工分”（工作组对非生产的扫雪记工提出了异议），折腾了几个月，最后扫兴而归。

不管怎么说，陈永贵与晋中地委的梁子已经结下，这种矛盾后来严重影响了晋中及山西文化大革命派系和走势。

同样，城市各大企业的“四清”也造成了基层的分裂，也成了各大单位派别划分的重要因素。如此一来，大量“四清”被整者在文革中就成为天然的造反派。

四、文革的四个阶段、机构、组织及主要人物

山西文革从1966年开始到1980年清查结尾，经历了近十五年的时间。其中经历了卫恒、刘格平、谢振华、王谦等四代“王朝”。这四个时期包含了文革发起、批判资反路线、一月革命风暴、政权分裂、武斗割据、军管、批谢、“四五”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清查“四人帮”等阶段。

在这近十五年里，各派政治人物、政治力量，“你方唱罢我登台”，演出了一幕幕气势恢宏，时而明斗、时而暗战、时而斗嘴、时而动武，有时是很血腥的历史活剧。

为使读者能够充分看懂剧情，特将主要剧中人和组织简介如下。

1. 前省委、省人委主要人物

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1915年生，山西陵川人，太岳区干部。

王谦，山西省委第二书记，省长。1917年生，山西平定人，太行区干部。1975年批谢（振华）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

王大任，山西省委常委、书记处常务书记。1916年生，山西沁县人，太行区干部。

贾俊，山西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1917年生，山西翼城人，太行区干部。运动初期曾任省委派驻太原市委工作组组长，太原市委第一书记。

2. 革命干部（指文革夺权中参与造反进入“三结合”的干部）

刘格平，山西省副省长。1904年生，河北孟村回族自治县人，山东分局干部。曾任国家民委副主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主席。1960年因“地方民族分裂主义”问题，被贬为山西省副省长。1967年“一一二”夺权后，任山西省省核心小组组长，省革委会主任。

刘贯一，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1908年生，直隶通州（北京通县）人，新四军干部。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59年未知原因下放北京机械厂任厂长，61年任国际大学常务副校长，63年任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是山西“一一二”夺权的主要组织者，夺权后任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副主任。

袁振，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太原市委第一书记。1917年生，山东掖县人，冀鲁豫区干部。曾任湖北省委常委、鞍钢党委第一书记、总经理。

陈守中，太原市委书记处书记。1912年生，河北阜平人，晋察冀干部。曾任包钢党委书记，夺权后任省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委常委，太原市革委会主任。

刘志兰，山西省委农工部副部长。1917年生，北京人，左权、陈守中夫人。曾任包钢党委宣传部长，夺权后后任省核心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

丁磊，刘格平夫人，山西省人委办公厅信访局办公室干事。夺权后负责省革委人事组，后任人事局长。

3. 军队干部

张日清，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由省委第一书记兼任）。1916年生，福建长汀人，开国少将，新四军干部。曾任24军副政委，文革时任山西省军区第二政委（第一政委由省委第一书记兼任）。是全国第一个支持省级夺权的军干，夺权后兼核心小组副组长、省革委副主任、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相当于公检法）主任。

谢振华，69军副军长。1916年生，江西崇义人，开国少将，三野干部。1967年69军移驻山西后任省革委副主任，“七二三”布告后，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

曹中南，69军政治委员。1914年生，河北景县人，少将（1964年），冀南区干部。“七二三”布告后，任山西省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省军区政委。

4. 群众组织人物（拥刘派）

陈永贵，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昔阳县委候补委员，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14年生，山西昔阳人。夺权后成为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同时兼职昔阳县委书记，晋中地委书记，成为山西拥刘派的旗帜。1975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解悦，太原纺织厂纺织女工，全国劳动模范。太原纺织厂红卫队负责人，山西省革委常委，红总站负责人。

杨承孝，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公司驻地太原）工人。1934年生，辽宁鞍山人。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总指挥。夺权时，任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总指挥。省革委成立后，任省革委常委。

郝廷云，山西电业局工人。1934年生，山西大学物理系肄业。山西电业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负责人，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总负责人。“七月会议”后任省革委常委。

高翔，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永红负责人，“七月会议”后任省革委常委，红总站负责人。

黄锐庵，省人委办公厅干部。东风兵团负责人，红总站负责人。“七月会议”后任省革委常委。

5. 群众组织人物（反刘派）

李顺达，平顺县西沟大队党支部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1915年生，河南林县人。文革中任中央委员、晋东南革委会副主任、平顺县委书记。

申纪兰，平顺县西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全国劳动模范。1929年生，山西平顺人。文革中任平顺县委副书记，山西省妇联主任。

段立生，山西省委党校学生。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负责人，红色造反联络站勤务员。红联站的代表性人物。省革委常委。

刘灏，太原五中学生。五中井冈山山兵团负责人，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司令。夺权后任太原市革委常委，“七月会议”后任山西省革委常委。

宋捷，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瑞金负责人，兵团副司令。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夺权后任省革委常委。

李青山，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红旗总负责人，红联站前期活动的实际指挥者。反对“一一二”夺权的实际操作者，夺权的“三评两告”（即质疑“一一二”夺权的三篇文章，反对夺权的两告全省人民书）的起草者。

杨保明，太原工学院学生。太工红旗负责人，红联站总勤务员。反对夺权失败后，被解除总勤务员职务。

赵凤田，山西省委党校学生。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负责人。1967年3月接替杨保明任红联站总勤务员；

张珉，太原重机学院学生。重院联总负责人。“九五”事件后，接任红联站总勤务员，并兼任红联站小分队政委。

赵凤岐，太原化肥厂职工。红联站职工部负责人。后任省革委委员，太原化肥厂武装部副部长。“九五”后任红联站小分队队长。

李辅，省委政研室干部。省委七一公社负责人。后任省革委委员，襄汾县委书记、平遥县委书记。

6. 官方、半官方组织（机构）

山西省核心小组是由中央指定的夺权时和之后替代省委的党的领导机构，组长刘格平。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夺权时的群众组织的联合临时指挥机构。总指挥杨承孝，副总指挥宋捷、朱永庚（首都红卫兵赴晋造反大队负责人、北京铁道学院在读研究生）。

山西省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夺权后替代公检法的临时领导机构。主任张日清。

7. 主要社会群众组织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决死纵队，简称决死纵队，大约成立于1966年10、11月间，开始时是冶金部第十三冶金建设公司及太原钢铁公司内部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夺权后迅速发展为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夺权参加了夺权、炮轰刘陈刘等重大事件，是拥护刘格平的两大组织之一，是拥刘派的主要骨干力量。总负责人是十三冶工人杨承孝。

山西批刘邓红色造反联络总站，成立于1967年4月下旬，简称红总站，是夺权后红色政权分裂，由刘格平夫人策划的跨行业的造反派组织，是刘格平的嫡系部队，另一支拥刘派的骨干力量。总负责人郝廷云。

山西革命造反兵团，简称兵团，成立于1966年10月26日，是以中学生为主的最早造省委反的造反派组织，开始的目标是为袁振平反。“一一二”夺权的骨干力量。1967年9月间，随袁振倒戈反对刘格平，后来发展为跨行业的山西最大的造反派组织之一，成为反刘派的主力，司令为太原五中学生刘灏。

山西红色造反联络站，简称红联站，成立于1966年10月26日，是以大学生为主的学生造反派组织，是最早造省委反的组织，开始的目标是批判省委的资反路线。曾反对“一一二”夺权，是反对刘格平的骨干力量。代表人物是山西省委党校学生段立生，总负责人杨保明（太工红旗）、赵凤田（党校东方红）、张珉（重院联总）、张玉峰（太工红旗）等。

山西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简称工人兵团，是山西最大的工人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太原重型机器厂工人张建国，1967年1月下旬因退出夺权、炮打关锋等问题，负责人被抓，组织被取缔。陈守中任太原市革委主任后，工人兵团被整合为太原市工代会（筹）。七月会议再次失败后大部又参加兵团，成为独立性很强的兵团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兵团工总司），成为武斗时期反刘一派的主要力量，负责人为端木雨田（国营大众机械厂红旗负责人）。

山西红卫兵团，成立于1966年8月20日，官方组织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相当于老红卫兵，“保皇派”，省委的“御林军”，一月夺权后被取缔。负责人山西大学学生刘普德（原省学联主席）。

山西革命工人联合会，成立于1966年10月，“保皇派”，省委的“御林军”，一月夺权后被取缔。负责人山西机床厂（247厂）工人张志安（青年工人诗人）。

8. 早期造反的著名基层群众组织

太原工学院红旗战斗队，最早向省委造反的组织，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强烈反对“一一二”夺权，负责人李青山。

太原工学院永红战斗队，原红联站下属组织，夺权时追随刘格平，成为红总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高翔。

太原工学院瑞金战斗队，兵团发起单位及核心组织，负责人宋捷。

山西省委党校东方红公社，早期造反组织，红联站发起单位及核心理论组织，负责人段立生。

太原五中井冈山兵团，最早向省委造反的组织，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刘灏。

太原六中 32111 公社，兵团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李金渭。

太原十二中红旗，兵团发起及核心组织，曾参加“一一二”夺权行动，负责人崔吉娃。

太原十中七一，早期向省委造反的组织，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田仿余、马尚文、王忠强。

山西冶金工业学校东方红，最早给省委贴大字报（1966年6月）的组织，红联站发起及核心组织，负责人吉顺行。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曾参加夺权后退出，加入兵团，负责人李大纲。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夺权时成立的省级机关干部为主的造反派组织，曾参加“一一二”夺权行动，刘格平的“卫戍”部队，主要负责人省人委办公厅秘书黄锐庵。

太原机械学院第四野战军，负责人韩宝山。

9. 地区群众社会组织

晋东南捍卫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总司或“红字号”，拥刘派，代表性人物程首创。

晋东南批判刘邓联络总部，简称联总或“联字号”，反刘派，代表性人物李顺达。

晋南地区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318”派，拥刘派。

晋南地区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简称“126”派，反刘派。

晋中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晋中总司，反刘派，负责人李兆田；

晋中批刘邓革命造反联络总站，简称晋中总站，拥刘派，负责人赵瑞华，代表性人物陈永贵。

大同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总部，简称“好派”，拥刘倾向。

大同军团，简称糟派，反刘倾向。

忻县地区二八野战兵团。

忻县地区联合总部。❏

【百年国史】

绘本特殊年代（九）

——漫笔文革岁月（1966—1976）

墨娃



开学啦！

1967年的10月14号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通知》，于是在11月中旬由北京市的所有学校都开学了。语文书发下来，内容全是文革当中的语言，没有汉语拼音标注。这本书我至今都保留着，只为铭记那个黑暗的年代。

我们这一拨儿人，读着这样的书长大，荒废的不仅仅是学业，还失去了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即便后来有不少人拿了各种文凭，也无扎实的学识。越是高层人，越读错字。

开学了。1967年10月14号，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通知，于是在11月中旬，北京市的所有学校都开学了。语文书发下来，内容全是文革语言，没有汉语拼音标注。这本儿书我至今保留着，只为铭记那个黑暗的年代。

我们这拨人读着这样的书长大，荒废的不仅仅是学业，还失去了思考和批判的能力。即便后来有不少人拿了各种文凭，也无扎实的学识，越是高层越读错字。



转眼到了1968年，育民小学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三天两头儿揪斗老师和校工。老校长杜兰池、孙宝湖也在揪斗之列。有一回揪斗杜兰池校长，有人用厕所的纸篓给她糊了一个高帽子。几个高年级同学把她从体育室押了出来。“打倒杜兰池”的口号儿瞬间响彻云霄。至今我都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

转眼到了1968年，育民小学的文革运动如火如荼，三天两头儿揪斗老师和校工。老校长杜兰池、孙宝湖也在揪斗之列。有一回揪斗杜兰池校长，有人用厕所的纸篓儿给她糊了一个高帽子，几个高年级同学把她从体育室押了出来。“打倒杜兰池”的口号儿瞬间响彻云霄，至今我都清晰地记着当时的情景。



跳忠字舞

文革开始不久，全社会掀起了“忠字舞”。尤其是红卫兵们纷纷组织宣传队，走街串巷又蹦又跳。主要的曲目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几个歌曲。无数狂热的人被愚昧封建洗脑，已经疯癫。如今我在街上、公园里依然能看见一些人张牙舞爪地跳着这样的乱舞，内心的悲鸣无法言表。

跳忠字舞

文革开始不久，全社会掀起了跳忠字舞，尤其是红卫兵们纷纷组织起文艺宣传队，走街串巷，又蹦又跳。主要曲目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大海航行靠舵手等等歌曲，无数狂热的中国人被愚昧封建洗脑已经巅峰。如今我在街上。公园里依然能看见一些人张牙舞爪地跳着这样的乱舞，内心的悲鸣无法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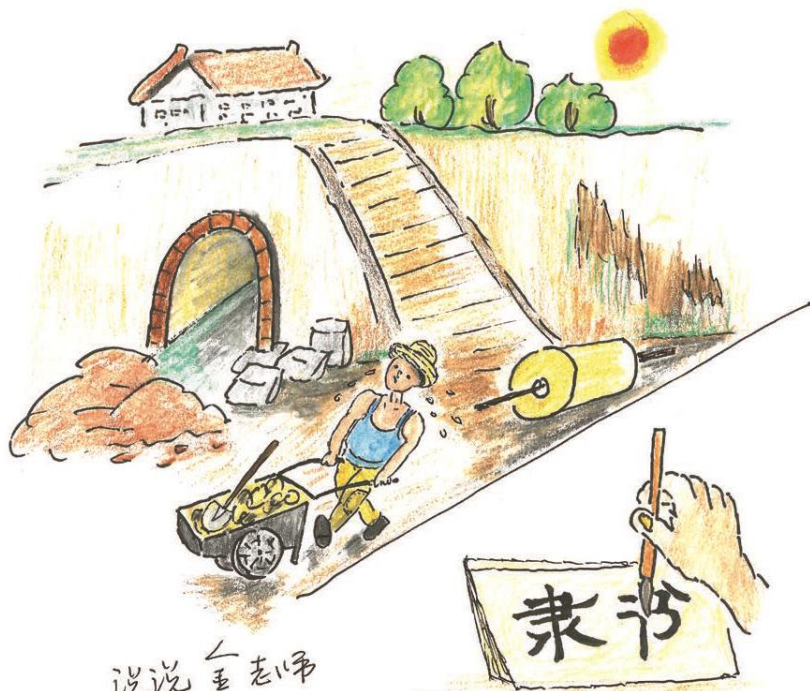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就是人们要每天早上七点在自家门前面对毛泽东的挂像高唱“东方红”，然后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晚汇报是每天晚上七点在门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高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从1968年至1969年，“早请示、晚汇报”，盛兴了一年多。封建愚昧，可笑至极。

·157·

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是人们要每天早七点在自家门前面对毛泽东卦象，高唱东方红。然后高呼庆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晚会报是人们每天晚七点在门前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并且高呼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从1968年至1969年，早请示，晚汇报，盛兴了一年多，封建愚昧，可笑至极。



说说金老师

我的书法绘画启蒙老师就是育民小学的美术音乐课教师金老师。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金老师为人随和、包容、厚道，尤其是长相帅，很招学生们喜欢。榜书、隶书写得非常好。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政治构陷，经常被调离岗位去劳动改造。记得从我小学四年级到上中学，金老师一直被强制挖防空洞。今天的金老师已经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他的全名爱新觉罗·毓俊，真是桃李满天下。

我的书法绘画启蒙老师就是育民小学的美术音乐课教师金老师。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金老师为人随和、包容、厚道，尤其是长相帅，很招学生们喜欢。榜书、隶书写得非常好。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政治构陷，经常被调离岗位去劳动改造。记得从我小学四年级到上中学，金老师一直被强制挖防空洞。今天的金老师已经成为著名的教育家、书法家，他的全名爱新觉罗·毓俊，真是桃李满天下。

说说金老师

我的书法绘画启蒙老师是一名小学的美术音乐课教师，金老师，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后裔。金老师为人随和、包容、厚道，尤其是长相帅，很招学生们喜欢。他的榜书、隶书，功底深厚，由于家庭出身问题，屡屡被政治构陷，经常被调离岗位去劳动改造。记得从我小学四年级到上中学。金老师一直被强制挖防空洞。

如今，金老师已经成为著名教育家、书法家，他的全名爱新觉罗 毓俊。已是桃李满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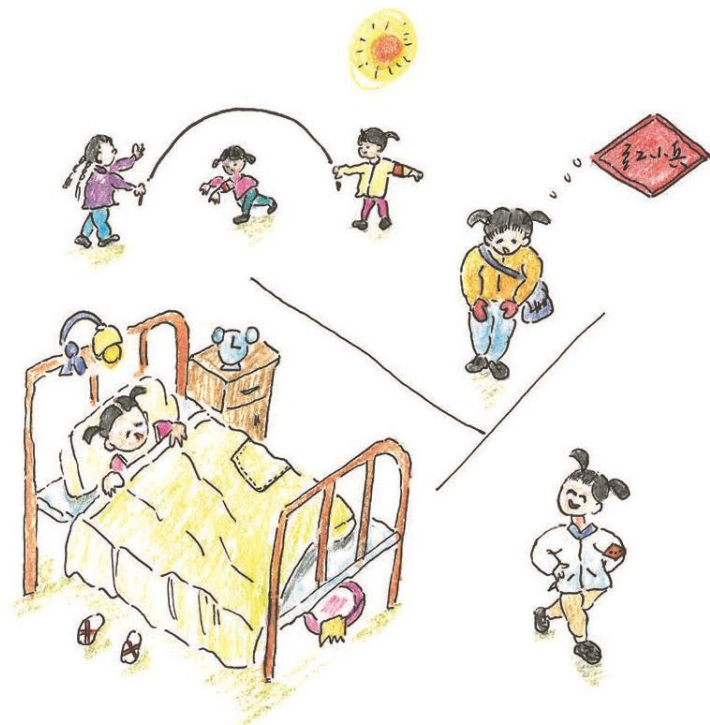


为人“狮表”

四年级的时候，班里来了一位从复兴路小学调来的班主任，她叫杨素洁，一双牛眼，一口东北话。她不仅极左，还嫌贫爱富，超级势利眼，对家庭生活不好，父母在文革中被专政，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常常是恶言恶语，冷嘲热讽；对运动中掌权的干部子女笑脸相迎，连姓名都省去了，叫“维维、霞霞、阳阳……”前两年，小学同学聚会，很多同学说，曾经被一个老师伤害过，我脱口而出：杨素洁！

为人“狮表”

四年级的时候，从复兴路小学调来一个老师，成了我们的班主任。她叫杨素洁，一双牛眼，一口东北话。她不仅极左，还嫌贫爱富，超级势利眼，对家庭生活不好，父母在文革当中被专政，出身黑五类的同学常常是恶言恶语，冷嘲热讽，对运动中掌权的干部子女则笑脸相迎，连姓氏都省去了，叫“维维、霞霞、阳阳”。前两年小学同学聚会，很多同学说，曾经被一个老师伤害过。我脱口而出，杨素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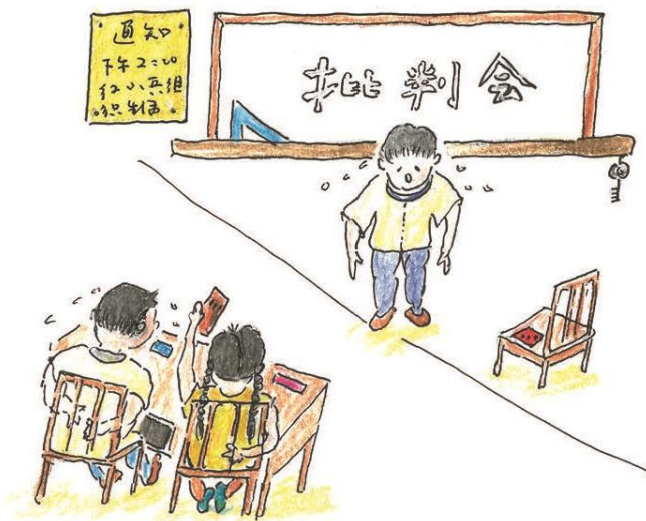
加入红小兵

加入红小兵组织这个福利，全是班主任一手决定。杨老师对干部子女，在+境好的情有独钟，很快就肯加入，可是我都到了四年级，还没加入。看见很多同学带着臂章蹦蹦跳跳，我心里很难受，晚上常常睡不着。有个高年级的同学出了一个主意，买一斤水果糖，没准儿就加入了。我真的叫我妈买了一斤水果糖，每天上学带几块给同学吃，没多久就加入了。这一天是1970年12月26日。重要的是我也给老师吃了……

加入红小兵

如果想加入红小兵组织，全由班主任一人决定。杨老师对干部子女、家境好的同学情有独钟，很快就能加入。可是我都到了四年级还没有加入，看见很多同学带着臂章蹦蹦跳跳，我心里很难受，晚上常常睡不着，有个高年级的同学给我出主意——买一斤水果糖分给同学们，没准儿就加入了。我真的叫我妈买了一斤水果糖，每天上学带几块给同学，没多久就加入了。这是1970年12月26日。

重要的是我也给老师吃了。



上五年级的时候,同班的同学赵小青,把女队长的
单位发的带有毛语录的日历卡垫在铅笔盒下,被铅笔弄脏了。
结果被同座位的侯姓女生给举报到杨老师,最后成
了政治事件,并且开了批判会,没完没了地写检查,差
点开除红小兵。如今赵小青早已移民加拿大,但是这件
事对他的伤害依旧挥之不去。一个制度中的告密和构
陷特色至今都没有走远,悲剧也继续在重复……

上五年级的时候,同学赵小青把毛语录日历卡垫在铅笔盒儿里弄脏了,结果被同座位侯姓女生举报给杨老师。最后成了政治事件,召开批判会,还要没完没了写检查,差点儿被开除红小兵。如今赵小青已移民加拿大,但是这件事对他的伤害依旧挥之不去。

一个制度中的告密和构陷特色至今还没有走远,悲剧也继续在重复。❏

【书讯】

《画说我的一生》在美国华忆出版

旅澳作家/画家刘海鸥第一部大型画册问世

这是美国华文记忆出版社，自创办以来，出版的第一本以彩绘图画为主体的图书。因画面对排版的要求较高，因此，画家与华忆总经理进行了多次切磋，并与排版编辑做了直接的交流。经过双方密切合作，和友好协商，终于高质量地完成了《画说我的一生》这本大型画册的印制工作，取得了双方都满意的效果。

《画说我的一生》曾在《记忆》上长期连载，其写实的画风和朴实的解说，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和称赞。美国多所高校的东亚图书馆收藏此书，欧美大学讲授当代中国史，也把此书作为辅助教材之一。



作者简介：

刘海鸥，笔名凌之，1947年出生，海鸥的爸爸，翻译家刘辽逸）30年代就加入了共产党，被捕出狱后，与党失联。此后再四要求恢复党的关系，无果。要求

重新入党，被拒。海鸥的爷爷刘荫远，同盟会成员，孙中山挚友，辛亥陕西首义将领，国民党陆军少将，四九年迁居台湾。刘海鸥作为可教子女，不能上大学，只能到北京远郊做小学老师。1978年以高中毕业的学历，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究生。毕业论文对当时全党全军全国大力宣传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的哲学命题提出批评，指出其理论上的缺陷和实用主义的隐患。表现出可贵的独立的学术精神。

1982年，刘海鸥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毕业后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做编辑。因生了二胎被停职，八十年代中期只能来澳，打工经年，将老公和一对儿女接到悉尼，一家团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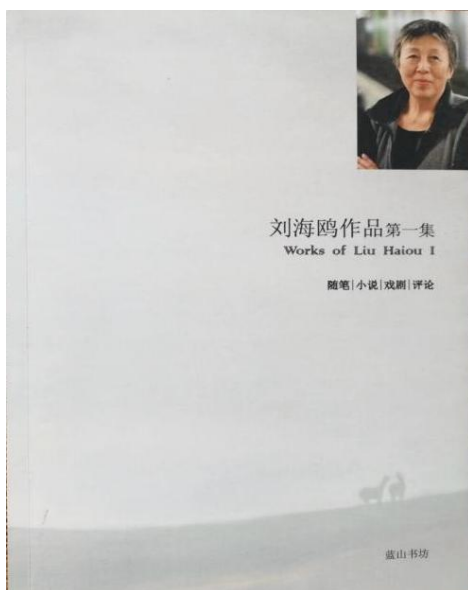
刘海鸥是作家，她的散文和小说在国内的《当代》《收获》上被作为重点文章发表，并在国外多次获得世界华文大奖，她自我调侃地说，她对奖杯奖状并没有多大兴趣，她

更关心的是奖金。确实，她多次谢绝到台湾领奖，她需要的是对补贴家用不可或缺的散碎银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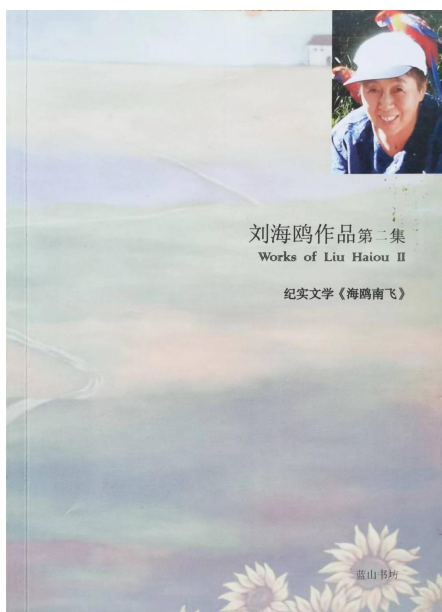
在做事做事上，她是老派，保持着传统文化人的谦逊、低调、淡于名利。因此，远离媒体的炒作，拒绝在澳作家中抛头露脸。但是，在澳洲的华文作家中，刘海鸥是重量级的巨大存在；在澳洲华文文学史上，刘海鸥占据重要一页。

澳洲文学评论家何与怀，在此书的序中，对海鸥的创作做了简略的介绍：

“刘海鸥，笔名凌之，澳大利亚重要的华文作家，三十多年来，撰写和发表了随笔、小说、剧本，以及评论等许多作品，但最出



色最大量也最重要的是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我把刘海鸥誉为‘澳华文坛纪实文学第一人’。例如：《半壁家园：刘辽逸家事百年》。刘海鸥追求历史真相，力图复原‘半壁家园’，花费十几年时间，写出了家族的百年历史，同时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所走的道路。读完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我不禁欣喜地感觉到，刘海鸥可以携带她的《半壁家园》进入世界华人家族写作史的殿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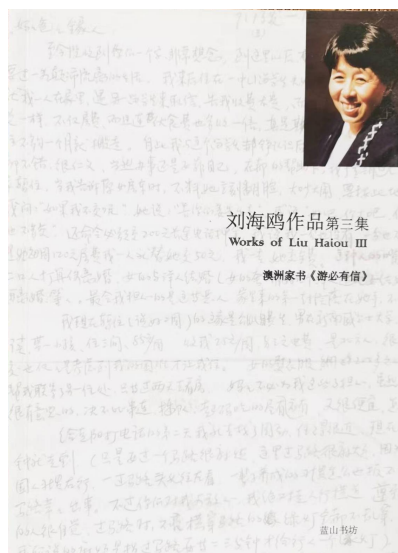


《夕出阳关》是海鸥为她姐姐刘海燕写的五十万字的纪实文学。此书再现了她姐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惨痛遭遇。“夕出阳关”这四个字，真是再确切不过，西出阳关的海燕的前途如同夕阳西下，不仅不见故人，而且面临的将是茫茫暗夜——她不属于这个世界。

《海鸥南飞》是“刘海鸥作品第二集”，是早些年出版的《海鸥南飞》的增订本。这些相关作品收编成一部具有连续性的长篇报告文学，记录刘海鸥在澳洲的生活，堪称之

为中国中年女性移民澳洲的全景式展示。

此外，刘海鸥还编辑出版了或准备出版《游必有信：澳洲家书》：这是她来澳洲以后从1988年到1994年写给父母的信件，不仅记录她个人的生活，还记录了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及澳洲社会发生的大小事件；《岁月留痕》是刘海鸥文集的第四集，收入各种各样的故人故事其中多是回忆，忆父母，忆旧家，忆邻居，忆朋友，忆同学，忆活着的与逝去的人们。《她们的田野》是她家四姐妹合写的纪实文学作品



记录了她们与共和国同步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刘辽逸日记》是海鸥父亲刘辽逸日记的汇编。刘先生是中国著名的翻译家，书中详细记录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文革过程，有着很高的历史价值……

【书讯】

湘人书坊出品《邓克生补编四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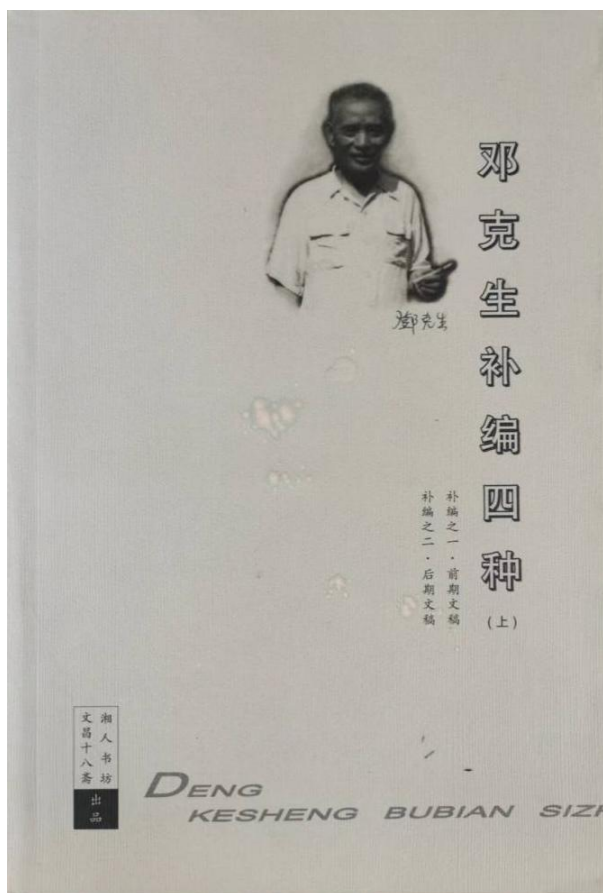
邓克生 1911年12月13日生于湖南长沙，族名德祯，早年随父经商，后主要从事财经工作与经济学研究，1976年11月28日在南京病逝。

上册

补编之一：前期文稿（1938年5月-1949年4月）

补编之二：后期文稿（1955年11月-1973年5月）

增编后，全书前两篇收书稿、文论、讲话共30篇，文字总量近30万。凭借



这些材料，基本可以看出先父盛年时期在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围绕着经济工作、经济理论，兼着行政事务与研究宣讲。前后两段的界点是，1952年当“大老虎”在“恶浪”中遭难，所幸没有被甩出大队伍。事后他自己选择了改行，自愿从厅局级降为处级，主动请求去当宣传部的理论处长，至今还被老熟人们笑谈不已。溯前析后，他所做的事，干净磊落，他也可以像顾准对孙治方所坦言的那样——“自己手上没有沾过别人的血”。尽管学问的建数上，先父与二位大有差距，毕竟是同一条道上的老熟人。

——邓伍文：补编的说明（代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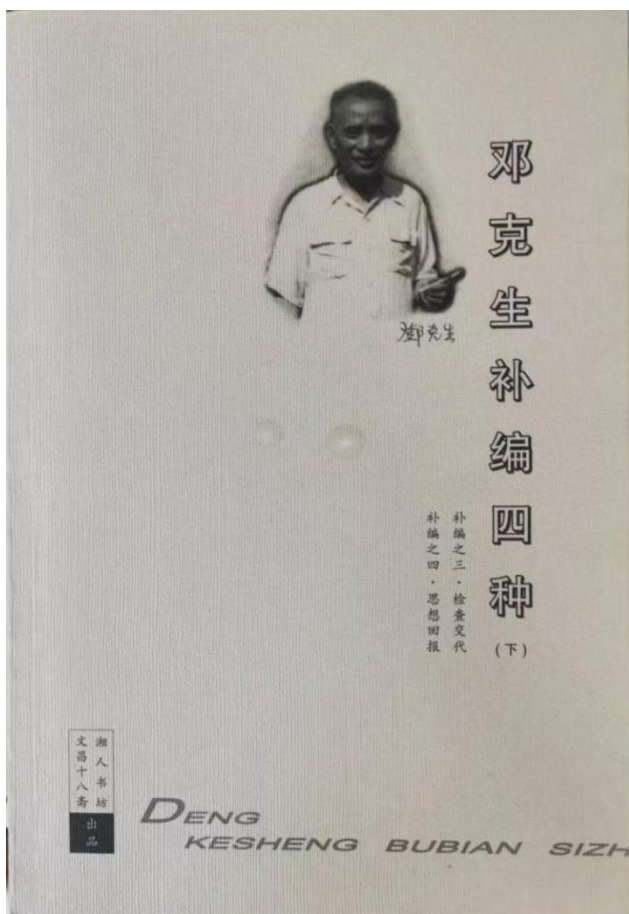
下 册

补编之三：检查交代（1964年—1969年5月）

补编之四：思想回报（1966年11月—1969年4月）

检查交代 26 份，从 1964 到 1969 年间，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题目，是一字不落。因涉及面稍宽，不得不倍加谨慎。整理完毕，即请先父的老同事们帮看看。把把关，消除明错，以避免事后道歉。

思想回报 122 份，起于 1966 年 11 月至 1969 年 4 月止，每周一份，写的很



认真，保留得一字不落，写于高压重重下。不敢得罪任何人，从头到尾，纯粹的个人角度，不代表他人或组织。40 多年后在公开，他没有多余的担心。并不顾忌会招惹麻烦。所以，在先父百年诞辰的前夕，以我们众子女的名义，用“灵魂受刑录”的书名儿，试印出四十来册。小范围纪念用。2011 年岁末，先父百年诞辰冥寿时，《灵魂受刑录》结合追思。再度透视文革，着重回顾像不像他的一生。

最后交代一下，重编的“补编四种”，四类分开，各类文稿的排列，依时间先后为序。各篇如需介绍，以页注作简要的说明，不再附加评点。为保留史料原貌，不作导读性的赘言。虽参照了业界的标准，但全书技术性的订正并未划一，而是采取分类各自适宜，各类规范的做法，具体细则各编略有说明。☞

——邓伍文：补编的说明（代前言）

2017 年 12 月下旬改毕

怀邓克生同志（代跋）节录

黎澍

邓克生同志是纸商邓龙高先生的儿子。邓龙高在长沙小西门儿正街开一家名为“以大纸庄”的商店。大约在1937年，邓克生26岁时，父亲去世，他帮同母亲继续经营纸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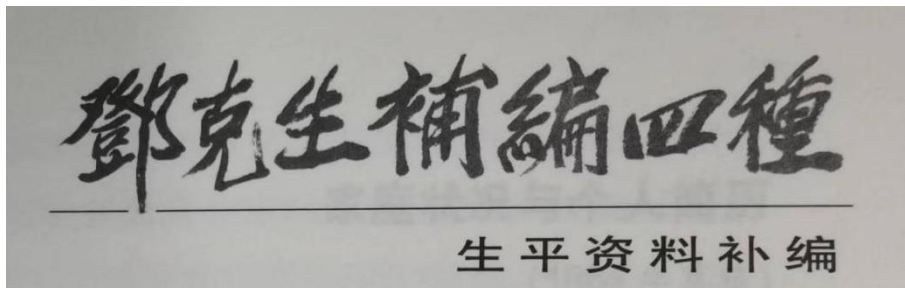
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把邓克生同志卷进了长沙学生的救亡运动，积极参加抗日宣传工作。他是李锐和魏泽同等主编的《湘流》三日刊和萧敏颂等主编的《前进》周刊等进步刊物的出资人之一，也是撰稿人之一。1938年又出资于杨润湘、冯秀藻、吴磊伯等创办《民族呼声》半月刊，兼为撰稿人，并在这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和唐文燮同为湖南省委创办《观察日报》的出资者。长沙大火前夕，湖南省委和《观察日报》迁往邵阳。邓克生结束“以大纸庄”业务，和母亲一起举家相随，到了邵阳。本来他也可以把母亲送到长沙乡下安顿，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可见当时下了毁家革命的大决心。无论如何，长沙的这一家纸商是因为儿子参加革命而消失了。这种事儿即使在全国可能也还是不多的。《观察日报》在邵阳出版，地处偏僻，发行范围缩小，收入随发行数量减少，每天数十人吃饭。连同其他费用，每月需补贴三四百元不等，全由邓克生支付。当时，报社党支部书记李生贤在向省委汇报时，对杨庚忘我工作，刻苦耐劳，邓克升一心为公，乐于助人特加赞许。省委副书记聂鸿钧补充说，在长沙大火前，省委决定迁邵阳时，邓克生曾捐款做迁移费用。

我在1938年春认识邓克生同志，他给我的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不仅给革命活动以经济上的帮助，而且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研究，是从事这个学说的通俗宣传的作家。他在《观察日报》特批的一个《经济学讲座》专栏，用深入浅出的文字，从解释日常经济现象入手，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那时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他都是异常勤奋的经济学家，先后出版有《新经济学讲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通俗讲话》《揭开商品价格之谜——谈谈价值规律》和《商品自传》等十多部著作。

邓克生同志毕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如我在最初接触中感受到，显然也包括他

对自己所从所出身的阶级性质的研究,因此,研究过程也是他的自我认识的过程。一个革命者因为自己不是工农出身而一生沉浸在自我认识中。其忠诚实在感人,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唯成分论成了知人论世的唯一标准,竟对如此长期尽瘁革命的共产党员横加污蔑,未免令人叹惋。☞



| 目 录 | |
|--|-------|
| (下) | |
| 补编之三·检查交代 (1964年至1969年5月) | |
| 家庭状况与个人简历(1964年草稿) | (367) |
| 关于定息问题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 (1965年1月12日) | (384) |
| 干部划阶级登记表(1965年2月) | (386) |
| 我的初步检查(1966年8月6日) | (392) |
| 给支委会并转省委的报告(1966年9月18日) | (404) |
|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的思想情况 (1967年3月26日) | (407) |
| 回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研究所的情况 (1967年4月19日) | (412) |
| 检查交代的提纲——在历次运动中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行 (1967年4月20~22日) | (417) |
| 我在1925~27年加入国民党的经过情形(1967年6月4日) | (425) |
| 我的人党经过及证明人(1967年6月8日) | (428) |
| 关于我曾一度加入CY的事情(1968年6月8日) | (430) |
| 我过去对于家庭财产的处理情况(1967年6月8日) | (431) |
| 在干部政策方面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交代 (1967年7月27日) | (433) |
| 我的姐姐——邓评(1967年8月24日) | (446) |

寄语“补编”

补就补他原始真实

编就编成供人评说

臧文 九十四岁 题

2017年11月28日,老邓去世41周年忌日

【书讯】

张宁静收集整理《榆次文革记忆》(续) 自印出书



作者简介：

张宁静，1949年出生于干部家庭，毕业于榆次二中65届初59班，曾有近八年的下乡插队经历。退休前，在榆次对外贸易局，一生酷爱读书和写作，在《榆次时报》《晋中晚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现为榆次、晋中和山西作协会员。有《榆次文革记忆》等书问世。☞

内容节选

“百日闹剧”——我的一场恶梦

由我自印的一本书《榆次文革记忆》（征询意见稿）引发的“百日闹剧”被社会关注，吵得沸沸扬扬，如今已降下了帷幕。期间，经过政府多个部门的调查了解，弄清了是非，还了我清白。

然而，由《榆次时报》刊出的那个失实“声明”，虽然报社领导口头上认了错，但却是难以公开更正的，因为，那样官方会大跌颜面的！

我是一位经历过风风雨雨年逾古稀的老人，就算时间如流水一天天过去，而有心人泼在我身上的那些污垢，还是留在这个社会上，留在不明真相者的疑惑中。

因此，我再三考虑：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没有自己的一份详细说明，或许那些肮脏的东西，就会成为永久的痕迹。为此，将我经历的一场恶梦，只有由我自己诚实面对，直接说明，理性表达，才是最好的沟通途径。

所以，我有必要将经历的这场“百日闹剧”详细经过记录下来，也为自己的人生作一份备忘录。我坚信：社会上总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

风云突变，百日闹剧骤起

在2020年9月底的一天中午，我突然接到晋中作协副主席，著名的作家陈亚珍女士的电话，告知我，有一位叫赵保江原二中学生退休民警向政府有关部门举报了你，说你自印的《榆次文革记忆》一书是非法出版物，你要注意些……随之，这场旷日的闹剧也就登台上演了……

2020年10月16日下午，我接到榆次新华街派出所警官赵某的电话称，你人户两地须来所统计人口登记，因正值星期五下午，我有事在外，故答应星期一去所办理此事。

10月19日下午，我到达新华街派出所，由赵警官陪同南副所长向我问话：你所写《榆次文革记忆》一书的由来讲清楚，我如实进行了回答：党的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全面否定了十年文革，称“十年浩劫”。习近平总书记也称之为“十年内乱”。我只是把十年文革中晋中，榆次曾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经过多年的深入走访调查，通过自己的认真梳理做了记录与整理，书中的文章很多都是报刊登过的，都有出处和当事人的证明，我只是属于对口述历史的记录而已。这本收集

整理的书只是恳请当事人斧正的。

新华街派出所南副所长紧接着问话：你的书没有申请获得书号，似非法出版。我回答：本书只是一本征询意见稿，自费印了少许，送给些亲朋好友斧正，待进一步坐实后，再向有关部门申请书号。再说，我书中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妄议中央，也没有境外散发，全是自费，更没有谋一分钱的利，为此，我不认可指控！致于“敏感问题”之说，我认为只是记录历史，保存那段历史。出于史料真实性的需要写出了一些事件中当事人的名字和事由，这是写历史，所以不存在什么敏感问题一说。再说，上级部门也没有通告那段发生在中国大地的“十年浩劫”历史不准记录。此刻，我严肃地向派出所领导指出：本人是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有写作的自由，同时也受法律的保护，而你们动用公安专政机关对待我，很让我不理解，并责问派出所领导，我到底犯了哪条法，你们依照那条法，然而他们无语，谈话陷入了僵局。

新华街派出所南副所长责令我把《榆次文革记忆》一书全部追回上交，我说：这是我个人财物受法律保护，至于你们开警车到我家收缴书，我以“公民住宅受法律保护”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行动，就此，我向派出所提出了抗议！并指出：写作之事不是公安机关所管的事情，南副所长随口说：确实不是我们公安机所管的事情，这是上级公安机关通知下来的，我们只是例行公事，就这样，新华街派出所的调查谈话在不快的气氛中结束了。

2020年10月29日新华街派出所南副所长又来电让我到所问话：上面认为是你书《榆次文革记忆》有问题，让责令收回上交，再次被我拒绝，随后南副所长追问我是否是中共党员，我回答说：非党人士。最后我愤愤地说：鉴于你们这样对待一位省级作协会员，再次向你们提出抗议！

2020年11月5日，新华街派出所南副所长来电说：你所说已将《榆次文革记忆》部分书送给史志、档案、文史部门收藏，经调查没有此事，我答本人有颁发的收藏证书。最后南副所长提出：上级要你交回4本《榆次文革记忆》准备送有关部门审查，仍被我拒绝。并再次向派出所提出抗议……

一次致命的谈话打压

2020年11月10日下午，我突然接到晋中史志院领导来电，随之我到达史志院，在路上我就纳闷不解：我与晋中市史志院不存在上下级行政关系，但我还

是接受了他的问话，看有什么事情。

在我到达史志院后，单位领导和我谈话说：上级已把你送给我单位存档的《榆次文革记忆》两本书收走了。又问你为何写这本书？书中涉及到众多领导和敏感事，你想到时谁能出来给你作证，最终还得你自己一个人扛。

我当即进行反驳并责问领导：你是代表政府和我谈话还是代表你个人？领导犹豫了一下说：也算是个人吧！领导继续说：你现在只有反思、检查、认错，求得上级领导谅解。我回答说：这本《榆次文革记忆》书只是如实记录了十年文革中晋中、榆次发生的些事情，都有出处和当事人的口述证明，我只是实事求是记录了那段历史，我只是一位属于对口述历史的记录而已，所以我认为没有做错什么。领导说：你的《榆次文革记忆》一书已惹上事了，高层很是关注，可能要追查，你抗不过政府，随便从书中找个问题就可取消你的退休金，随便从书中找个问题，就能立案，把你抓起来！我听后十分气愤，立马反驳说：我所做的一切没有违法，你们虽然手中有权，但我坚信中国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就这样，在一片争论中结束了这次意外致命的谈话打压，我也愤愤的离开了晋中市史志院。

说明：史志院领导为什么如此打压我？是因为他以前曾多次给我诉说过郭凤莲的一些劣迹，我的文章惹上事后，他怕牵连到他，故向我施压，让我闭嘴。

被诬陷后造成的恶果

2020年11月2日，据榆次区政协接到个别人的举报后，在11月9日的《榆次时报》登出一则“声明”中称：对其假冒政协委员和抄袭文史资料（原作者郭思俊）《模范民兵连长马驹儿》一文予以严厉谴责，并采取了相应的法律措施，现向社会各界予以澄清。此文登出后，引发了一些不明真相群众的热议，给我也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带来了名誉上的损失和精神上的伤害。

2020年11月18日，我接到榆次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重案组负责人张智警官的电话，让我到新华街派出所接受调查。我到所后，由几位领导和警官在验名我身份后（出示身份证）联合向我问话：在宣布完本人应遵守的纪律签字后，就政协指控你，“假冒政协委员”一事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似三堂会审）。

面对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重案组的指控，我如实进行了回答：2013年的一天，榆次区建东社区领导鉴于本人在退休后，热爱写作，反映社会正能量500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省、地、区一些报刊杂志，很受群众的欢迎，为此，社区领导推荐

我加入政协组织，经锦纶街道办事处领导研究并报上级批准后给我颁发：“政协第十五届榆次区，街道工作委员会”“委员证”界别：文艺，编号：044号。所以不存在假冒政协委员一事。况且，建东社区，办事处也出具了证明。在重案组领导将“政协委员证；盖有两枚公章”的证明验证后，还了我一个清白，纯属诬陷。随之宣布调查结束。

事后，经过调查得知：榆次区政协副主席冯丽红接到赵保江（老乡）、赵春德的举报，仅听一面之词，在未曾调查了解以及与本人见面核实应有的工作程序下，也没有盖章的批文就责成《榆次时报》登出，严重违背了工作纪律，以及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给本人造成不应有的严重后果。

我认为：榆次区建东社区，办事处给我出具证明是合情合理，为什么冯丽红副主席只身亲赴社区进行打压领导：说社区无权出证明，扬言要取消社区领导的工作岗位，并下令迅速追回社区出具的证明，作废！在追查无果的情况下，又通过关系找到本人孩子的电话进行打压。

建东社区领导是推荐我加入政协的经办人，出具证明符合常理，再说，证明不能随便出，也不能随便销毁，而作为区政协副主席冯丽红这种作法又是为何？很让人深思与不解！

2021年2月3日，我去《榆次时报》找到刘红英总编责问“声明”一事，她不得已承认：声明没有集体研究，更没有盖章的批文，只是冯丽红副主席，从手机上传给她让登出，个人行为不妥，对不起！表示汲取教训……至此真相大白！

2020年轻11月17日晚8点17分，我接到榆次区作协范主席的通知，要我参加本月18日在晋源饭店召开的“晋中市文联文学创作培训会”。同日晚9点15分，我突然接到榆次区作协主席范某的电话称，有人要在明天的会场散发传单，打出大幅标语，可能与你有关，建议你回避，我当即指出，本人参加会议合法，如有人闹事，可报警！后经范主席再三做工作：为保证会议正常进行，同时保护作家，在未弄清是非的情况下，再次让我回避，经我再三考虑，为顾全大局，同意放弃参加会议。同日晚10点21分，我突然接到榆次区作协的“重要通知”：各位作协会员：鉴于明日晋中文联举行的会议有变化，榆次区作协全体成员不再参加明天晋中文联举办的培训会议，望大家转告”。

我认为：发生这样不正常的事情，致使榆次区文联，作协全体成员缺席晋中

文联的会议，很是让人痛心与不解！

榆次区文联作协，晋中文化缉查队敢于直言

2020年11月23日，榆次文联、作协两主席就“声明”一事通知我接受调查谈话，同样我将建东社区，办事处如何推荐我加入政协经过如实进行回答，同时我将盖有建东社区，办事处两枚公章的证明以及颁发的政协委员证交付验证。调查谈话结束后，还了我清白，同时领导严肃地指出：是别有用心的赵保江、赵春德自来文联举报的，纯属诬陷！

榆次文联、作协领导重调查，重证据，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及敢于直言，伸张正义，保护作家，令我感动不已……

2020年11月25日上午，我接到新华街派出所警官赵某来电称：晋中文化缉查队要去你家谈关于你所写《榆次文革记忆》的事由，当即被我拒绝！

2020年的12月2日，我接到晋中文化缉查队党同志来电，让我到缉查队谈话。第二天上午（12月3日）9点我到达缉查队部。由党同志陪同高队长和我谈话：请你把所写《榆次文革记忆》一书的前后情况说清楚，我如实进行了回答。最后由高队长宣布，我们对你这件事本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扩散，不下文，不处罚，冷处理的办法，就此结束了谈话。

最后，我提出，不管由我撰写《榆次文革记忆》一书是否有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进行谈话了解，为何动用公安部门这样对待一名省级作家，让我很是不理解！高队长解释说：动用公安机关之事，不是我们所为，那是上级宣传部门所为，与我缉查队无关。这让我更是纳闷，这是何故？让人百思不得一解！

临别时，高队长告知我：史料一定要继续收集整理，鉴于目前形势，可印成A4留存。不要印成书。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很容易惹上麻烦，引起波动。分手时，还特别嘱咐我说：这几年你发表文章太多了，太出名了，所以必然会引起一些别有用心的嫉妒，要远离小人，保护好自己……

综上所述：当地新华街派出所受上级委派和我几次谈话，公安局国保大队重案组，晋中文化缉查大队，以及区文联，作协的一系列调查谈话调查至此全部结束了，弄清了是非，还了我清白。就此，由一本书，一篇文章引发的百日闹剧以及引发的社会热议降下了帷幕，烟消云散了。■

【书讯】

王晓林著《薛明剑、孙治方兄弟》在美出版

【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



薛明剑、孙治方兄弟

——
中国经济学界奇异的
双子星

王晓林
著

N-XUE & YEFANG-SUN

他们是一对真正的双子，却从未有人将他们相提并论过
他们生命乐章的交响如此奇异，却从未引起人们的好奇
他们都曾作为政坛之星闪烁过，却相隔了几近半个世纪

 博登书屋
Boudin House
New York

作者介绍

王晓林，1953年生。16岁在湖北荆门县插队，18岁在长江航运公司做工人，20岁进入北方交通大学做工农兵学员，毕业于该校电信系无线专业，后进入交通部科学院做通信工程师，是改革开放时期深圳特区最早的建设者，与最早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打交道从事通讯设备贸易和工程者，中国最早的个人电脑与因特网使用者，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曾经的捐赠者和至今的志愿者。2001年退休，偶尔投稿《炎黄春秋》和《温故》杂志，正式作品仅有此书（2009年出版）与《顾准和他的时代》（2015年出版）。

自2001年至今，除了“孙冶方基金会志愿者”之外，没有任何头衔和“挂靠”单位。

作者的话

本书旨在介绍一对同父同母的亲兄弟——民国民间经济学家薛明剑和中国首席官方经济学家孙冶方。本书只限于讲述两兄弟在完全不同甚至是不通的两条人生之路、经济学之路上是如何起步行走，如何渐行渐远，又如何奇迹般地汇合，并达到精神和心灵上的沟通。假装对任何人的生平做出完全“中立”的描述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像我这样既非专业出身，又非“圈内”的人，写作本身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立场。

希望能向读者呈现两个合理的、稳妥的人物形象，他们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像我们行走未远的亲爱的祖父或外祖父那样可亲可近，可摸可触，可敬可爱。



【评论】

“爷爷，爸爸不是共产党”

——海鸥《画说我的一生》读后

老方

海鸥是旅澳华文作家兼画家，这本书又在海外问世，所以，我请了两位海外著名作家为之赐序。受邀者之一，北美的一位著名媒体人，刚看了前三集就谢绝

了。理由是不喜欢海鸥小时候的任性。我后悔“敲门”时太仓促，如果把海鸥获奖的小说和油画先给这位朋友发过去铺垫一下，介绍《画说我的一生》（下面简称《画说》）受欢迎的程度，也许会得改变她的印象。

话说回来，最应该给《画说》写序的，应该是我。首先，海鸥给《记忆》带来了光荣——《画说》在《记忆》上连载了28期，不但赢得了墙内的中国读者，而且为研究中国的欧美大学所关注。更重要的是，海鸥是用连环画重写国史的第一人，是她创造了现实主义的画风，是她找到了连环画的新路。作为《记忆》主编，向墙内外的读者介绍一下海鸥，谈谈我的读后感，责有攸归，事无旁贷。

一、让连环画回归现实

《画说》是一部由600多幅画组成的连环画，画的是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海鸥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经历。画法是传统的线性白描，构图是传统的散点式，叙述方法也是沿袭传统的倒叙、插叙、旁白等文学手法。唯一违背传统的，就是这些画的思想指向——贯穿这本画册的主线，是毛时代对人与社会的改造——中学时的思想革命化，出身对她的迫害，父母挨整，姐妹插队，她在中学教书的种种遭遇。这其中的重点，就是她按照党的教导，对自己从思想一闪念到生活中一举一动的监督和改造。

改开以来，涌现的画家无数，画技画法画风林林总总，画展画集画册目不暇接，谁见过这样的连环画？谁见过如此直面毛时代的画家？谁见过如此理性的自我解剖？我有几位画家朋友，他们也直面现实，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用几年的工夫去画这种不能在大陆问世的连环画。

海鸥不想成名成家，不想在技巧上出新出奇，她只是想画出真实的自我和真实的中国。她崇尚的是现实主义。

在中国连环画的百年历史上，写实一直是个弱项。民国时期著名的连环画家也曾写实，叶浅予的《王先生》系列和《小陈留京外史》，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赵宏本的《上海即景》《天堂与地狱》《阿Q》《桃李劫》等连环画也都以揭露性和批判性受到广泛欢迎。但是，整个毛时代，这些画家全部投入到歌颂革命英雄的宣传队伍中去。他们的笔下没有了民生的苦难，只有忠君爱党的政治热情。他们的艺术细胞中，没有了正常的美感，有的只是“高光亮”的“革命美”

学”。后毛时代，这些画家载誉而退，他们在党多年，洗脑彻底，已经丧失了反思历史的勇气。

与张乐平、叶浅予不同，海鸥画的不是漫画；与赵宏本不同，海鸥不是用别人的脚本，而是自出机杼。海鸥的白描技法，比刘继鹵、顾炳鑫差得远；海鸥的构图造型，不过是贺友直、丁斌曾的小学生。但是在写实这一点上，这些连环画名家在海鸥面前，应该汗颜。

后毛时代，尤其是“六四”之后，一些老党员、老干部、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良心发现，意识到不但自己上当受骗了，而且也成了制造骗局的一份子。创作《翻身的日子》《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作曲家朱践耳，在改开后陷入深深的内疚之中——农民并没有翻身得解放，“城乡二元”将他们打入社会的最底层。党不是母亲，而是主子，人民只是党的工具和奴仆。这种持久且不能轻易为人道的痛苦，或许也存在某些著名的老画家内心的深处。

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美国的一位华人政论家冯胜平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凡是亲历文革的都是“文革人”，都有罪，都应该为十年浩劫负责。他忘记了毛时代一直受迫害的，数以千万计的“黑五类”，忘记了以各种方式反抗专制，牺牲了生命的志士仁人。他不知道，还有海鸥这种人的存在。

二、真实性与政治环境

为了写这篇序，我把能找到的海鸥写的书全看了。以我的看法，海鸥的小说不如评论，评论不如纪实。也就是说，虚构性和想象力不是海鸥之长，她的长项在于以非虚构方式写真人真事。我编辑过数百篇传记、回忆录和纪实性作品，长期的阅读让我麻木，以至厌倦。只有海鸥的百年家史《半壁家园》，令我欲罢不能。以至顾不上收听每天不落的自媒体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吸引我的是什么呢？除了作者的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真实。何与怀博士说，她“可以携带她的《半壁家园》进入世界华文家族写作史的殿堂”。我要补充的是，《半壁家园》将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所有写传记和回忆录的人，都告诉读者，他们要把真实的历史留下来。即便是连北大文革的基本事实都弄不清的“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也拍着胸脯如是

说。我相信大多数作者都有这样的愿望，也都努力这样做。但是，我敢断言，比起海鸥在求实求真上下的工夫，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会自愧不如。

最近，大陆出了一本很不错的书《寻常百姓家》，作者么书仪，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教授洪子诚的夫人。此书真实地记述了她的父母家人在毛泽东时代的经历。黄子平有这样的推荐语：“寻常百姓家的日常生活，即使在非比寻常的非常年代，也是视而不见地默默流逝着，流逝了。幸好有么书仪老师用水洗过了一样新鲜无华的文字，精准幽微的细节，从忘川中为我们撷取了如许‘有情的历史’。”

“如许‘有情的历史’”竟能通过审查，让我吃惊不小。常识告诉我，作者为了它能在大陆出版，一定煞费苦心。洪子诚的序，在隐约含混之间，透露了个中消息：

因为回忆中涉及许多人和事，它们并不都适合“秉笔直书”，带着很不情愿的心情做详略增删的处理，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也都让她苦恼而费尽心思。

本书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坚持的是“不虚美，不隐恶”的信条，“真实”是认定的前提，也是最高的标准。她（指么书仪——本文作者）确实也是按照她自己对“美”“恶”“真实”的理解来处理所写的生活情境的。

我是这些文字的最初读者，我对回忆的“真实”既存疑惑，有时也会产生那样的想法：必要的时候“虚美”和“隐恶”也在所难免，甚至需要。因此，在具体写法上，就常会发生争辩。这当然会影响到书中的一些叙述，也就是在她最初确立的“真实”的坐标上，有些地方的标准有所降低。“降低”，当然不是说真假不辨，以假乱真，而是说有所节制。

如果把海鸥的《半壁家园》与么书仪的《寻常百姓家》做一比较，你就会发现这两本书的异同，作者都是毛时代的亲历者（海鸥1947年出生，么书仪1945年出生），都是文革后的第一批文科研究生，都在细节的真实性上下了大功夫，不同的是，么书的细节“精准幽微”。海鸥的细节精准，但不“幽微”——她挑选的细节锐利、隽永，启人心智，与这些细节配套的评论，一针见血，发聋振聩，全不懂得“节制”。随手举个例子——

海鸥的爷爷刘荫远¹，当年的西安首义元勋，1949年以前，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他唯一的儿子刘长菘²（海鸥的爸爸）加入了共产党，致使刘荫远在国民党内颇受非议。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刘长菘大学毕业，回西安见父亲。刘荫远给儿子下了“最后通牒”：你只有两条路，要么离开共产党，要么永远别回家。刘长菘毅然与父亲断绝了关系。从此，父子分道扬镳，音尘两绝。

尽管如此，海鸥的爸爸却始终得不到党的信任。他1935年入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在西南联大时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出狱后，做了随军翻译，因部队经常转移，流动性很大，遂与组织失联。此后再四请求恢复党的关系，无果。要求重新入党，被拒。海鸥爸爸晚年时，组织动员其入党，遭老人婉拒。改开之后，海鸥的姑姑从台湾来北京，问海鸥的爸爸：“两个党的统治你都经历了，你认为这两个党相比怎么样？”这位著名的翻译家回答：“两党相比，共产党比国民党最坏的时候还要坏”。

“九十年代中下期，爸爸台湾的侄子来京探亲，临走时爸爸请侄子到他父亲的墓前代为祭奠，并替他转告父亲一句话：父亲，我不是共产党。”2003年，海鸥到台湾：“我跪在阳明山爷爷的墓前，替爸爸说了这句话：‘爷爷，爸爸不是共产党’。”海鸥评论：“当年爷爷曾迫使爸爸离开共产党，否则就断绝父子关系，爸爸选择了后者。时至今日爸爸却用这样的话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绝大的讽刺呀。”

为了这些细节的精准，海鸥录下了父亲的回忆，整理了双亲留下的信函日记，去了南京、杭州、上海、广州、安徽、西安，走访了父母两系的亲友及后人。并四次去台湾，到台湾国家图书馆查阅了与爷爷有关的史料，包括爷爷的好友徐永

¹ 刘荫远（1890—1961），安徽濉溪人。毕业于陆军大学第四期，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回国后，历任皖北民军司令，陕西省参议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1945年9月，授陆军少将。1949年退居台湾，任国大代表。蒋介石曾两顾茅庐，请其出山参政。刘荫远告蒋实情：“我还有一个儿子在大陆，如果我出来任事，儿子就没命了。”蒋只好知难而退。1961年病故，公祭三日。蒋经国题写碑文，总统蒋介石和副总统严家淦分别颁送谕词：“谥论流徽”“谥谓扬休”。立法院院长于佑任亲书挽联：“辛苦拥中央欲消大陆新劫运，殷勤叙开国尤忆关西旧战场”。

² 刘长菘（1915—2001），安徽濉溪临涣集人，生于北京。曾在南京安徽中学、北平大学附中读中学。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党支部书记。1936年2月加入抗日救国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并被党组织派到华北中学组建“民先”。1936—1939年，先后在北平大学法商学院、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学习。1939年3月，因领导西北联大反解聘进步教授的斗争，被陕南国民党务督导专员办事处肃反组逮捕。两个多月后经保释出狱。1939年秋，自西北联大毕业，从事随军翻译工作。1949年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译审，主持俄文翻译工作。以刘辽逸的笔名翻译了20余部苏俄著作，如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克莱采奏鸣曲》《哈吉·穆拉德》《哥萨克》，果戈里的《外套》，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高尔基的《童年》，法捷耶夫的《论创作》《论文学批评的任务》，及《前线》《太阳的宝库》等。

昌的回忆录³，当年的报纸和照片，还孤身一人，深入阳明山，寻找刘荫远的墓地……。

真实性是分层级的，所谓“细节的精准”，其实就是细节能否反映出当事人的处境和心态。而这完全取决于作者所处的政治文化环境。我无从知道，么书在哪些地方做了“详略增删的处理”，是哪些地方为“选择恰当的措辞和表达，让么书仪”苦恼而费尽心思“。但是，我相信，享有言论自由的海鸥在详略增删和措辞表达上的苦恼，不会受政治的影响，她的心目中，没有一个内化的书报审查官。换句话说，她不会降低她最初确立的“真实”的标准。

三、海鸥的自我改造

《画说》是海鸥的思想改造及转变史。改造是主要的。

海鸥有个性，她的个性主要表现在自由散漫：上课不但偷看小说，还会把鞋脱下来，第九集中有这样一幅画：讲台上，老师提问，一个女生光着脚尴尬地站着在课桌后面，桌子下面的大脚趾不知所措地翘着，好奇地四处张望，周围的同学窃笑。



把一个比胶囊还小的二极管收音机的铜丝连在暖气管上，“塞上耳机，手做托腮状，若无其事地听节目。这个简陋的小玩意只能听一个台，关键不在听什么，而在于上课捣蛋的刺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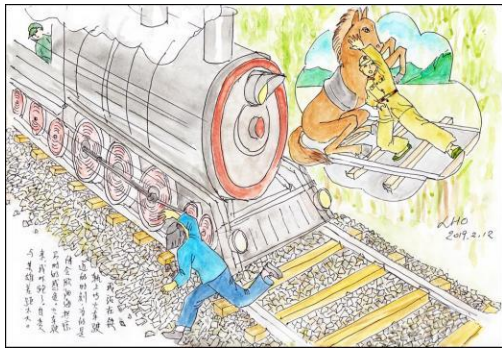
她高中的“期末操行评定连年为‘中’，评语还是小学初中那老一套——不遵守纪律，不尊重老师，自由散漫，骄傲自满……”。“阶级斗争紧锣密鼓的时刻，我的自由随意已经不属于个人品质问题而是思想意识问题，评语开始上纲上线，变成了‘要注意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加强改造思想’。”

从高二开始，海鸥就投身于思想革命化之中。她要与自由散漫做彻底的决裂。她向组织交心，写思想汇报，反省自己与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及工农兵的思想的差距——

³ 徐永昌（1887—1959），山西崞县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1945年8月17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东京湾举行的盟军受降典礼，并代表中国政府在接受日本投降书上签字。此后，任陆军大学校长，南京政府国防部部长。1949年年底，退往台湾。1952年，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资政，晋升陆军一级上将。著有《求己斋日记》《回忆录》《杂记》《言论集》等。

我认真地写了一份，第一次对自己的成长过程进行了反思，我认为把自己的“坏”说得越严重，认识就越深刻。我的思想汇报写了四五页纸，通篇充满自责。我批判自己因为看西方古典小说听西方音乐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给自己加上了“个性解放、个性自由”的帽子。

海鸥的思想汇报成了老师批评她的口实，她的毕业的操行评语不但还是一个“中”，而且把她写得非常糟糕：“里面仍是充斥着‘要努力改造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一类的语言。在那样的年代这样的鉴定基本上就宣判了这个人的



政治死刑。”她的高考成绩优异，但早在她埋头备考之前，老师就在她的档案里写下了四个字：“不予录取”。

她被分配当了中学教师，在师院附中实习期间，她的自我改造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培养“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她周末与解放军一道挖京密运河。在铁轨旁考验自己，“体会一下欧阳海抢救列车时的情景。”——

火车已经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吓得夺路而逃。为此我心里竟难受了好久：难道我不敢去救人吗？这只是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的事情，只要稍一犹豫，就可能人亡车毁。没有人会怪罪你，但是你怎么能经受住内心的自责？追根寻源还是脑中的“私”字作怪，有私心必然怕死，必须继续狠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由此我学习英雄的事迹更加努力，《欧阳海之歌》看了好几遍，在他抢救火车前的那一段心理描述，我抄录下来，反复朗诵。

她要“革心洗面，积极进步，和过去一切所留恋的东西决裂。”她意识到：“更可怕的是无形的敌人——每个人心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它们随时随刻将我们拉进资本主义的泥坑，因此要彻底改造思想。我始终热情高涨地投入

各种活动。”“我和大家一样，满怀革命理想，以革命前辈为榜样，向往着战争年代，渴望在非常时期献身革命。”

在第十集里，有这样一幅画：一个穿着病号服的少年，从病房门外进来，手捧着一个插着花的小瓶，递给一位梳着短发，挎着黄书包的女教师。海鸥对这幅画做了如下的说明：

一个学生病了住院。我到医院去探望他，见他独自住在一间高级小病房中（他爹是某军种司令员），意志很消沉悲观。我安慰他说：“到外边走走吧，春天已经



已经到了，草也绿了，桃花已经开了，到外面吸口新鲜空气，你会觉得头脑清醒，心胸开阔的。”他很感动，我走时他主动和我握了握手，他曾是一个不和老师说话的傲慢孩子！

第二天我再去看他时，见他蹒跚地从外面走进来，拿着一个小瓶，里面装了几枝含苞的桃花，他说：“我要把春天带进病房。”显然是我昨天的话起了作用。我立刻产生了不安的感觉，在他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道路上我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这是以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去进攻人家内心的薄弱环节，让他产生了不健康的感情，我决定今后宁可跟学生们谈严肃的思想，谈教条的理论，让他们感到生硬，感到暂时的失望，也要把无产阶级思想灌输给他们。

1966年初，《解放军报》连续推出一论、二论、三论、四论、五论、六论“突出政治”的社论，《人民日报》悉数转载。海鸥一遍遍地学习，“我的日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和学生开会的提纲记录，谈话的要领，全是一个中心：突出政治”。“对于我来说，突出政治就是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我必须和一切资产阶级思想断绝联系，首先把自己锤炼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然后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从此，我对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个思想闪念要问一下是否突出了政治。如果没有，就在头脑中展开猛烈的批判。”

然而，“小资情调”仍然没完没了地纠缠着她——

一天下午，我们正在开什么严肃的会，已经是1966年的5月份，文化大革命即将正式拉开帷幕。突然间从琴房传来小步舞曲的钢琴声，虽然弹琴的手并不高明，但那早已深入我心的旋律，又被激活起来。我立时觉得心都醉了，头也晕了，一切思想都被打乱了，不能思维了，人被音乐带走了。



海鸥心里有一种深深的失落感。但是，她不知道失落了什么。她所能做的，就是谴责自己的个人主义，怀疑自己不可救药。她画了这样一幅画：几个教师围着桌子学社论，一个蓝衣女性呆坐一旁，侧坐沉思，在她的后面，一女正在弹钢琴，五线谱从琴中悠然飘出。画面的上方，是蓝衣女性的想象——她手握钢枪，指着一个洋人的胸口——她要“狠斗私字一闪念”，杀死头脑中的全部小资思想：

我又为自己的陶醉隐隐不安。我觉得自己像在漫天大雾中行走，总也摸不清方向，只有犹豫和错误伴随着自己，难道就这么下去吗？我又像在一个大漩涡里挣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爬出个人主义的泥坑。只要稍稍放松思想改造，它就冒出来，只要外界稍稍有一点诱发力，如今天的小步舞曲，它就跳出来，难道我永远要像堵枪眼一样地紧张绷着神经吗？难道我真是不可救药了吗？当天晚上我就学习毛著对“琴声事件”展开检查和批判，很快我就调整了心态：脑子中的一团混乱其实不乱，一条线就可以提拉起来，这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必须毫不留情地用快枪迅速击毙。

文革来了，百分之百地相信党，相信党报的海鸥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我连着几夜没有睡觉，写大字报，支持学生，和学生老师互通有无。即使没有事干了，也不去睡觉，写日记写思想总结或捧着一本《毛选》读到天明。有的时候我夜间骑车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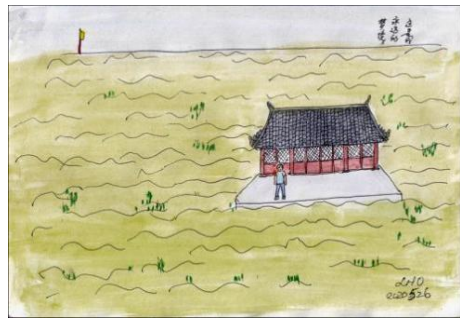
我第一次切切实实地感到世界要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了，学生造反的时代到了。革命的浪潮正在以势不可挡之力把我卷入激流，我要以最饱满的革命热情投身到斗争之中。但什么是文化革命，革谁的命，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只有一个信念，跟着毛主席和党的战略部署走定然没错。我写了支持造反派红卫兵的大字报，又贴了《质问校领导》的大字报。

海鸥的革命热情得到了回报——师院附中的红卫兵贴大字报，揭发她谎报出身，冒充革干子弟，质问她是怎么混入团组织的，骂她“企鹅”（因为她胖）。红卫兵抡圆了铁锹毒打她，以至打断了锹把。她的家被多次查抄，父母的全部藏书，除了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全部拉走。

海鸥离开了师院附中，离开那些抄家打人的红卫兵。为证明自己的革命，她到外地串连，步行长征，深更半夜为造反派送情报。面对顶着胸脯的长矛，她面不改色，喝退了武斗者，保护处于弱势的造反派。……她用了二百多幅图画，勾勒出文革初期的混乱与狂热。

1968年春节之后，海鸥被分配到一个公社中学。在那里，她度过了十年的光阴，学校的混乱，家族的离散，农民的赤贫，在她笔下一一呈现。尽管她敬业爱岗，无私奉献，仍旧自我洗脑，对党和毛忠心耿耿。像后毛时代的某些作家、学者那样，她歌颂苦难，相信只有经过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自己的思想才能变得纯净起来。“自觉彻底地自我洗脑”成了她的日常功课，但是，在她的潜意识中却是另一番景象——

在后半生中，我无数次地梦见永丰……或是房子怪异，要爬梯子，上了半截，梯子突然断了，退路没有了；或是发大水，永丰成了一片泽国，我摸索原来的道路回家却被包围在一片汪洋中；要不就是赶不上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最糟的是好不容易上了车，开了一大圈，发现又转回原地。总之梦境高度地概括了我在永丰期间内心深处的潜意识——绝望，绝望，绝望。



四、海鸥的觉醒



海鸥的思想转变，是从1976年的“四五事件”开始的。尽管毛泽东去世的时候，“我心中的毛泽东还是在神坛上，只不过在晚年时被身边的佞臣架空，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做的，并非毛的本意。”但是，她已经停止了自我改造，回归到了理性和常识。

1978年，她以优秀的成绩，成为北大哲学系的第一批研究生。

我对研究生完全没有概念，也不知道该怎么读。第一次开会时黄先生问我们各自准备研究什么题目，我说：“我想研究中国人为什么这样。”把大家逗笑了。我实际想说的是，中国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到底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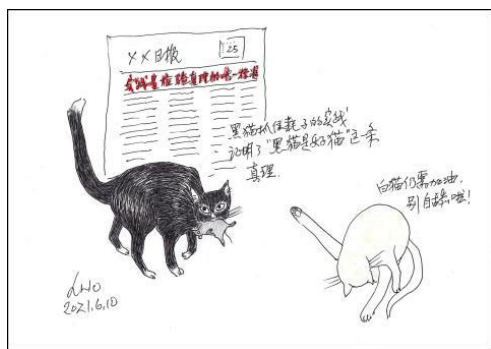
她首先想到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既然中共中央否定了“阶级斗争为纲”，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根本上架空了文化革命“成果”。那么，她就应该对自己这些年的思想改造有一个彻底的反省：

我实际上是困惑的，因为否定文革就是对我这十年生命的否定，这十年我即使没有百分之百也至少把自己百分之八十的青春精力热情投入了文革之中。我几乎脱胎换骨地换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按照文革给我们指定的标准所变的新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斗士，然后一下子这些都是错误的，反动的。就像文革开始时一样，我又要否定自己的一切作为，来一个否定之否定，尽管没有人要求我这样做，尽管这样做是痛苦的。但是我不能这样糊里糊涂地翻来覆去，我必须搞明白，为什么我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民能够一呼百应地疯狂地投入这个错误的运动，这和几千年中国社会的结构、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的民族性有什么关系。若是再碰上一次这样的革命（老毛说“这样的文化革命每隔七八年来一次”），我不能再把自已来一个否定之否定之否定了。

从这时起，她那自由散漫的天性，升华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1981年，她在毕业论文中剖析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错误。

我觉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提法并不完全科学：如果说实践活动是一种标准，如同说吃饭是检验饭菜是否好吃或胃口好坏的唯一标准，睡觉是检验神经功能或睡觉环境的唯一标准，从语法和理论上都说不通；如果说实践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语法上可站得住脚，而理论上和前一命题一样隐含着唯经验主义的导向。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它是胡耀邦为了否定“两个凡是”的一个命题作文。1977年秋，在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胡福明执笔写成第一稿之后，又经过了党内理论家多次修改，1978年5月10日发表在中央学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光明日报》就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然后是各大报纸的转载。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关于真理的大讨论。邓小平有云：“《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么大的反应……不要小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争论。这场争议的意义大了。”中共党史称此文“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是中共党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中共“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做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在官方为这一哲学命题大唱赞歌，理论界紧跟，全国的知识分子为其叫好的时候，海鸥对它发出了冷冷的一问。

改开之后的历史，证明了她的先见之明：“实际上‘黑猫白猫论’就是这条命题的通俗表述，‘黑猫白猫’在国民经济

几近崩溃的时代是改善民生的权宜之计，但长此以往，它可能会导致实用主义的社会后果。”“当今社会出现了很多弊端，从理论上说与片面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无关系。”

直到三十年后，才有人想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缺陷。

五、罹患脑瘤之后，海鸥拿起了笔

海鸥的文字在国内《当代》上发表，在海外多次获得世界华文大奖，她的油画在澳洲两次获奖。尽管每次得奖，她都抱着“山中无老虎，猴儿称霸王”的心态，灰溜溜地不愿示人。但是，这些奖项都在在证明她不是浪得虚名。

既能写又能画的人，历来不多，我们这一代（40后50后）更少。常听国内有所成就的人，在表彰大会上说，感谢党的培养，国家给了我荣誉云云。他们说的是不是真心话，暂且不论。至少这话不能用在海鸥身上——因为她的爷爷在台湾，她被排除在大学门外，尽管她努力工作，忠君爱党，得到的也永远是组织的冷眼。直到她因超生受尽屈辱，不得不去国离乡。

八十年代中国出了以曲啸为首的四大演讲家⁴，“母亲错打孩子论”是他宣讲的核心思想。当年他在北大演讲的时候，一个比我小十二岁的同学，在底下嘀咕：“就欠红卫兵把他抽死”。曲啸从营口教育学院副院长调到中宣部，以局级调研员的身份，满世界演讲达2500场。被授予“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

“错打孩子论”的逻辑是，母亲出于爱，错打了孩子。孩子因此经磨历难，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于是，张贤亮在《绿化树》中“歌颂苦难”⁵，徐葆耕在《清华精神生态史》中大讲“苦难铸就辉煌”⁶。照此逻辑，孩子取得了今天的成就，端赖于母亲当年的错打。具体到海鸥，如果没有党国对她的迫害和侮辱，她就不会出国，不出国就不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因此，海鸥应该感谢党，热爱党。

《画说》里没提曲啸，没提“错打孩子论”，那时，海鸥正在为保住腹中的女儿苦苦挣扎。

⁴ 其他三人是李燕杰、彭清一、刘吉。

⁵ 张贤亮（1936—2014），中国当代作家，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1957年7月“反右运动”期间，因创作了诗歌《大风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押送农场“劳动改造”长达22年。1980年，发表了《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等短篇小说。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绿化树》。1985年，发表长篇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2008年出版随笔集《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2009年发表长篇小说《一亿六》。

⁶ 徐葆耕（1937—2010），清华大学文学系主任，传播系系主任，人文学院副院长，著有《反击》《邻居》等五部电影剧本，出版《西方文学：心灵的历史》《紫色清华》《西方文学十五讲》等学术著作。《清华精神生态史》是其遗作（北京，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

百度百科上说：“曲啸到美国给留学生做巡回演讲。但在美国第一站就被爱国华侨，近代历史学家汪荣祖教授揭穿其谎言，令他不得不中断演讲计划回国。这个事件导致了曲啸心理崩溃。曲啸回国后也没有休养过来，不久就大脑出了毛病。1991年，在江苏省南通市演讲时，病倒在演讲台上，从此半身不遂，失去说话能力。”

几乎是与此同时，在澳洲攻读博士学位的海鸥患了脑瘤，医生给她做了开颅手术。从此她中断学业，在打工和做义工的同时，她拿起了笔，描述了“母亲”对“孩子”的一次次“错打”，“母亲”对“孩子”的改造。她揭示了“母亲”与“孩子”的真实关系，道出了苦难的来源，回答了隐藏在“错打孩子论”后面的“迫害有功”论。

六、《画说》的意义

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们，时时会为毛粉之多而愤怒而惊诧。以至于有人提议，建立一个“毛时代特区”，请那些怀念毛的人们搬到那里去，重过计划经济、城乡二元、阶级斗争为纲的生活，重新体验“红太阳”“斗批改”“红色暴力”“全面内战”“上山下乡”“五七干校”。

历史不会照原样重来，但它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改头换面，移步换形。

2020年9月17日，同济大学召开“上海高校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工作推进会”，会议拿出了《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要以专业类别为基础单位，结合不同课程特点、思维方法和价值理念，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研制课程思政教学指南，建立课程思政操作规范。”“从制度规范层面，进一步巩固确立上海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先发优势，重点解决教师不主动做、不知道怎么做、不能长期坚持做的问题。”⁷

复旦、同济、上海理工、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纷纷推出了本校的特色产品。随后，华东师大社出版了全国首本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研究丛书。

《生物学科课程思政教学指南》的第一个教学实例，就是“政治认同感”：

⁷ 同济大学新闻网。

在生物分子的世界里，小到一个原核细胞大到一个多细胞组成的高等真核生物，分子世界均遵循它们自身规律，忠实地将母本细胞中的DNA复制遗传给后代，保障了物种的稳定性。这里，便可以和一代代共产党人继承“红色基因”，坚持为人民服务，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红色传承相关联，达到政治认同教育的目标。通过这个知识点的讲述，教师可以将分子世界与人类社会进行类比，告诉同学“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红色基因”。

2022年4月15日，大陆出版的《新课程报 语文导刊》的“作文指导版”上刊载了一篇文章，题为《红盖头》，作者余显斌。文章大意是，爷爷随身携带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一个红盖头，那是奶奶和爷爷结婚时戴的，而奶奶是被爷爷亲手打死的——当年，爷爷帮游击队员筹集了一笔经费，可贪图享乐的奶奶想把经费带走，于是爷爷大义灭亲，开枪打死了他的枕边人。文后的“品读”写道：“读过这篇文章的人不能不为这位亲手处决自己妻子的革命者的高尚人格、伟大的家国之爱动容。”

海鸥经历的思想改造运动，正在打着“强我中国”的旗号，披着爱国、民粹和伪科学的外衣，以更加精深和荒谬的方式，向那个以扭曲“三观”，践踏人性的毛时代迅跑。

不止一位朋友告诉我，他们的儿女担心孩子会成为红小兵和红卫兵，正在办移民手续——如此全方位地向“红色文化”的回归，使越来越多的大陆人加入了“run”的行列。

七、海鸥的担当

1990年5月，留学澳洲刚刚一年另十一个月的海鸥，被查出脑瘤。开颅手术之后，在生死线上挣扎了几个来回的她，回顾匆匆走过的四十三年的岁月，一瞬间，她似乎活明白了：

回顾一生，为这个主义奋斗，为那个事业献身，到头来主义事业像倾斜的大厦，呼啦啦地地坍塌下来，头脑中一片废墟。到老牛破车时才到异地寻找一块自己的立足之地，依旧自虐似地背负“神圣的社会历史使命”，心力交瘁，死而后

已。一辈子活得真苦真累。……我们为什么不能活得轻松一些呢？像眼前的澳洲人一样，不去咀嚼历史，也不暇瞻顾未来，只追求此时此刻的快乐。

这本连环画告诉我们，死里逃生的海鸥，依旧在“咀嚼历史”，依旧在“瞻顾未来”。她无法让自己及时行乐，无法把自己变成真正的澳洲人。在出院之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她念兹在兹的，就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毛时代的真相，警醒国人不要忘记过去。女儿对中文的陌生，使她意识到，仅仅用文字难以吸引“读图时代”的孩子们。写完了《我在中国的四十年》之后，她又拿起了画笔，再一次背负起启蒙后代的“社会历史使命”。

很多人看不起连环画，以为它不登大雅之堂。中国当代国画史上，也不见连环画一席之地。鲁迅提醒人们，西方教堂里那些伟大的壁画，“几乎都是《旧约》《耶稣传》《圣者传》的连环图画”“连环图画不但可以成为艺术，并且已经坐在‘艺术之宫’的里面了。”⁸

《画说》不能在大陆出版，是国家的耻辱，是民族的悲哀，是画家的遗憾。但，这也是海鸥的骄傲与光荣。☞

【评论】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评《忠奸人》

一 清

台湾新大华国际发展有限公司2019年出版的《忠奸人》，作者啸雷称“本书……以深入的文献考证，及翔实第一手资料，梳理撰写而成专题性史料。”（见该书第4页，下文只注页数）该书对刘少奇的个人历史重新进行了审视和考证，该书引证了海峡两岸较丰富的资料，有助于我们开拓研究视野。该书对刘少奇的历史提出的疑点，也值得探究。但是，该书列举的证据和推论均存在明显瑕疵和严重缺陷，其推导、认定刘少奇两次被捕叛变的基本结论是不能成立的。本文根据现有资料对该书做以下评述。

⁸ 鲁迅《“连环图画”辩护》。

—

《忠奸人》对文革中《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简称《审查报告》）和文革后《刘少奇案件复查组》的《关于刘少奇案件的复查情况报告》（简称《复查报告》），以及叶翔之（国民党军统重要人员、台湾国防部情报局局长）关于审查该案件的专案报告（简称《专案报告》）等海峡两岸的有关资料进行了对比、考证。对文革中，刘少奇专案组通过刑训逼供炮制假证的事实避而不谈，不予置理，反而认为刘少奇专案组提供的证据“极为重要，珍贵”，“无可辩驳”，“比较扎实、可靠、相互印证，亦与事实吻合”（第22页、第173页、第219页）。从而，偏执地认定刘少奇两次被捕叛变。这种罔顾历史事实，不讲基本证据的推理，违背了史学的学术规范，不能不使人怀疑该书的政治目的。

1. 1925年刘少奇长沙被捕案

《审查报告》称：1925年11月，刘少奇从上海回到长沙，12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经审讯，湖南省长赵恒惕批示将刘“斩决”。后刘接受赵的活命条件“不在湖南活动”，叛变革命。1926年1月获释离开长沙到广州。（第29页）专案组关于此案的刘少奇叛变的直接证据，为刘的小学同学杨剑雄（时任湖南省长公署会计）的供词，以及刘作衡（刘少奇胞兄）、黎泽泰（时任湖南省长公署文牍）等多个证人辅助证据。（第36、46页）并无戒严司令部（军法处）的对刘审讯记录，赵恒惕将刘“斩决”的批示，军法处收押及释放刘的公文案卷等关键原始档案证据。

《复查报告》称：刘少奇出狱系全国总工会和全国各地工会纷纷通电要求释放，湖南上层人士保释等各方营救的结果，并无“叛变求饶活命”。（第73页）

《复查报告》列举了当时各方营救的文电和报道。对《审查报告》列举的证人的口供证据进行了辩驳。指出杨剑雄的证词并不能证明刘的叛变，只能证明刘少奇是保释后驱除出境的。其他证人的口供是在专案组的逼供下形成的假证，不足为凭。（第73页）

而《忠奸人》提出了《复查报告》的疑点，杨剑雄自称参与营救刘少奇，而刘否认此事，称自与杨小学同学后，素无来往，后杨被处决。（啸雷，2019，80）

该书又引证了叶翔之的《专案报告》，认为提供了新证据。称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曝光”后，1967年底，叶就此案在台湾拜访了赵恒惕。赵回忆：当年刘被捕后，原想将刘处决，后赵部贺耀祖、叶开鑫两师长出面具保，刘接受了离开湖南的条件，被释放后离开长沙赴广州。（第78页）

此所谓新证据存在明显疑点。

其一，该书称：叶拜访赵的时间为1967年底，是因为当时，刘少奇的历史问题“曝光”，叶遂去拜访赵。这里存在明显时间差错。专案组的《审查报告》初稿写于1968年元月，初稿并无列入相关证据，延至当年10月才定稿，⁹提交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此后刘的历史问题才“曝光”。叶是如何在近一年前就知悉此事，并目的明确地去拜访赵的？

其二，叶对赵的访谈是一对一的，而今赵已去世，何以证明访谈内容的真实性呢？而最能证明当时情况的原始记录的是赵1925年当时的日记。而该书作者称：赵当时的日记至今仍存于台湾的档案馆，该书作者曾查阅过，但“不料再去时，竟被告知被列为密件”，不让查阅。（第4页）（平日查阅都可以，而一旦需要提供证据时，就又成了密件，此事蹊跷。）连当年国民党镇压台湾人民的二二八事件的档案都已开放，¹⁰蒋介石的日记都已解密，任人查阅。近百年前的赵的日记何以至今仍会严密封闭？这不禁使人怀疑叶对赵访谈的可信度。

因此，《审查报告》和《忠奸人》提供的新证据都不足以证明刘1925年在长沙叛变。

2. 1929 刘少奇奉天纱厂被捕案

《审查报告》称：1929年7月，刘少奇到东北任满洲省委书记，8月21日和孟用潜（省委组织部长）在奉天纱厂被厂警逮捕，在厂内被审讯时，刘即叛变，承认省委书记身份。后被押送警察三分局，经审讯后移交省会公安局。经复查后移交奉天高等法院。其后的审讯中，刘均承认了身份，并出卖了党组织和其他省委负责人，导致满洲地下党组织遭破坏。刘叛变后与张学良达成协议，承诺将他释放出狱，他在外提供情报，配合进行反苏、反共活动。9月18日，奉天高等法院将其释放。（第146页）

⁹ 黄铮：《晚年刘少奇》第339、3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

¹⁰ 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献与历史研究》第3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审查报告》中关于此案刘叛变的证据只有孟用潜、刘多荃（时任张学良卫队团长）等八位证人的口供，指称刘叛变。其中，孟用潜、刘多荃的证词最直接。而此案当时经历了层层递进的司法程序，刘被厂警逮捕，被押送警察分局，后又移交省会公安局，最后移交奉天高等法院。每一环节都应有审讯记录，收押及移送刘的公文，和最后高等法院的判决书等案卷。《审查报告》没有提供任何一件这样的原始档案证据。文革中，经戚本禹提议，江青批示同意，专案组在沈阳组织四百人查阅了东北存有的1929年前后的档案一百多万卷，费时两月，一无所获。¹¹

对此，《忠奸人》的作者也承认《审查报告》“缺乏审讯记录，法院判决等证据”（第123页）。

文革中，在物证查找无望情况下，专案人员将当年在奉天纱厂、满洲省委、警察局、奉天高等法院等做过事的人员编印成册，按名单找人。将名册中尚存活的十几人统统关押审讯，刑训逼供，炮制了刘少奇叛变的伪证。

文革后，《复查报告》对这些证人的口供进行了复查，其时八位证人只有孟用潜、刘多荃等五位在世，他们均翻供，《复查报告》指控刘少奇专案组对证人进行了刑训逼供，证人被逼做了假证。孟用潜被长期关押，“经过连续七天的日夜突击审讯”，作了假证。孟作了违心交待后，“多次口头和书面申诉，推翻假供，前后达二十次”，一再说明这些交待“都是假的，并没有事实根据”，“写材料是在审讯小组帮助之下集体创作”。“但这些申述都被扣押或销毁了”。¹²

另一重要证人刘多荃也遭到专案组的逼供，刘说：1968年1月“专案组把我与外界隔离看管起来办学习班，然后反复和我谈话”，“精神上的折磨是难于忍受的”，“只好按他们的意思写了”假证。¹³刘多荃说，当年指证刘少奇叛变的两份材料，是按照专案组摘录的材料“抄写的”。其实，他根本没有听说张学良同被捕人达成的“政治交易”。¹⁴直到1972年，刘才被专案组放出。

另一证人陈元瑛，1968年11月被专案人员监护起来，1972年才放出。期间曾遭专案组“前后七天连轴转”审讯，“不让睡觉”¹⁵在此逼供下，陈作了假证。

¹¹ 《晚年刘少奇》第316、331页。

¹² 《晚年刘少奇》第330页。

¹³ 《复查报告》，转引自《忠奸人》第179页。

¹⁴ 《晚年刘少奇》第330页。

¹⁵ 《复查报告》，转引自《忠奸人》第180页。

专案组对其他证人也采取了类似的逼供手段。在审查刘少奇案时，在江青、康生直接指令或指使下，专案组直接扣押的人员达六十人之多，（不包括各地扣押的人员）其中有的被刑训逼供致死¹⁶。《审查报告》提交的证人口供多是这种刑训逼供的结果。

《复查报告》否定了专案组提供的证人的证词。结论是，刘少奇被捕后没有暴露身份，敌人没有掌握煽动工潮的证据，最后，奉天高等法院判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第174页）。

《忠奸人》对比了《审查报告》和《复查报告》提供的证据，对《复查报告》指控专案组对证人刑训逼供制造假证之事避而不谈，却引证了叶翔之的《专案报告》，认为提供了“最珍贵”的新证据。称叶1967年底，就刘少奇1929年奉天被捕案拜访了张学良。张回忆：当时接到密报，有被捕共党人，要求合作，承诺被释放后提供情报，共同反苏反共。张当时签文同意，由手下人去办了。以此证明刘的叛变。

叶所说张学良的回忆同样也存在疑点。其一，拜访时间有明显差错，理由同上。其二，张已去世，无法证明真伪。但张学良的档案仍存于台湾，近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有关档案早应解密。叶的《专案报告》和《忠奸人》的作者为何没有举出任何一件当年的审讯记录等档案卷宗物证呢？

应当指出的是，无论是当年的专案组提供的证据，还是《忠奸人》重新审视刘少奇历史，均无列举当事人刘少奇对被捕经过、狱中经历、如何出狱的自述，¹⁷这是证据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规范的审查程序应当是对刘少奇关于被捕的自述、其他当事人的口供和当年的审讯记录等原始档案物证这三部分证据进行一一比照对勘，细密考辨，才能复原真相。事实上，1968年2月11日，刘少奇为说明事实真相，曾向中央办公厅提交了关于自己入党、被捕等历史的书面陈述材料。¹⁸专案组故意隐匿了这方面的材料，《忠奸人》也对此避而不谈。

并且“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听取过他的陈述和解释”。“专案组存在的三年时间里，从未同刘少奇、王光美接触过，一次也没有听取过他们的申述。”¹⁹

¹⁶ 《晚年刘少奇》第323、333页。

¹⁷ 《审查报告》仅列举刘少奇简历底稿片段。《忠奸人》第166页。

¹⁸ 《晚年刘少奇》第371页。

¹⁹ 金冲及：《刘少奇传》第109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晚年刘少奇》，第321页。

从证据学看，档案资料等原始物证的证明效力是高于证人的口供的（档案资料也需要考证其真伪）。证人的口供，或因记忆有误，或因外界压力故意隐瞒，歪曲，都可能存在大的偏差，甚至是假证。所以，证人的口供都需要与档案资料进行比照，仔细甄别才能证明其效力，方能被采信。

《忠奸人》列举了刘少奇修改简历、当时媒体关于刘以共党罪被逮捕的报道等，质疑《复查报告》关于刘未暴露身份的说法。《复查报告》未能辩驳、澄清所有这些疑点，

综上，虽然刘 1929 年奉天被捕案还存在一些疑点，但《审查报告》指证刘少奇 1929 年奉天被捕叛变的现有证据，仅有证人的口供，而且《复查报告》指出这些口供是在专案组刑讯逼供下做出的假证。叶翔之的《专案报告》提供的新证据也只是张学良的口述回忆。缺少当年的审讯记录、法院判决等原始物证，也没有与刘少奇的自述进行过比照、考辨，因而，不能确凿证明刘叛变，所以，是不能凭信的。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不能判定刘少奇的叛变。

纵然如此，《忠奸人》仍固执认同专案组提出的证据“极为重要，珍贵”，“有些证据非常清晰有力”，“无可辩驳”。（第 22 页、第 173、第 219 页）仍武断宣称刘少奇“完全符合中共对‘叛徒’的定义”（第 441 页）认为刘从此就叛变、妥协、与国民党合作。并且将这种武断的推导延展于审视、分析刘少奇的一生。

《忠奸人》作者认为刘少奇夫人何宝珍 1933 年在上海被捕、1934 年在南京的遇害都可能是刘出卖的结果。因为刘少奇“在 29 年奉天案中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被何宝珍知晓(刘被捕时何与他同在奉天)”，故刘少奇“极有可能曾经叛变，对其前妻的死负有决定因素”，“是不是丈夫出卖妻子”。（第 242 页、第 261 页）1933 年刘少奇尚在江西苏区，1934 年刘还在长征途中，何以能出卖远在上海、南京的何宝珍？该书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这种胡乱揣测，凭空捏造的推断一直延及文化革命。

《忠奸人》作者引证叶翔之的说法，称刘少奇 1933 年曾由苏区前往天津、上海等地，一方面承认“因缺乏证据，暂无法对刘这次秘密出行做出结论”，另一方面却说：“笔者可以大胆得出一个结论，期间刘少奇曾被密捕”。（第 257 页）而刘少奇自 1932 年底由上海到达苏区，至 1934 年长征，此段时间刘一直在

苏区。²⁰何时能分身前往天津、上海等地，又在何时何地被捕？《忠奸人》对刘少奇如此重大的指控，竟无提供任何证据，完全是凭空假想。

1963年，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台湾国防部情报局西贡站金边组图谋制造爆炸谋害，被我公安机关事先破获。²¹“而这恰好是在叶翔之突然飞到当地指导该项行动之后发生的”（第426页、第427页）因此，《忠奸人》作者称此案可能是叶翔之“出于——保护刘少奇”而有意泄密的结果（第427页）。但也没有举出任何证据，更是令人匪夷所思的编造。

《忠奸人》作者称：文革时，刘少奇受审查、被打倒时，“叶翔之始终没有在文革中将任何不利于刘少奇及其派系官员的证据提供给中共”（第426页），就是出于保护他的目的。

“笔者在本书的结论——可以肯定刘少奇的行为符合中共的‘叛徒’定义”。“刘少奇可能是国民党潜伏于中共高层最大的内线”，“他也许就是国府自己人”（第431页、第365页）。这就贯穿《忠奸人》全书的基本论点。

刘少奇是文革的最大焦点。江青、康生为了彻底打倒刘少奇，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采用非法扣押、刑训逼供，制造假证等手段，炮制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个文革第一冤案。三中全会后，刘少奇冤案的平反昭雪，是邓小平、胡耀邦彻底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举措，由此拉开了拨乱反正的改革大幕。

时隔四十年后，《忠奸人》又重新翻出刘少奇案，重弹江青和文革专案组的老调。²²以毫无根据的杜撰，荒谬无稽的捏造和恶意涂黑，死死咬定刘少奇是叛徒。其目的就是为了诋毁、攻击邓小平、胡耀邦否定文革、平反冤假错案的改革路线。²³但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四十年改革的历史证明，改革的浪潮滚滚向前，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

二

《忠奸人》作者称：“本书……以深入的文献考证，及翔实第一手资料，梳理撰写而成专题性史料。”（第4页）但是，从上述《忠奸人》的逻辑推导使

²⁰ 《刘少奇传》第184—201页；《刘少奇年谱》1933-193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²¹ 《刘少奇传》第938页。

²² 江青文革中曾指控刘少奇是美国特务。《晚年刘少奇》第340页。

²³ 《忠奸人》书中直白：要“新角度看文革”“重新思索文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第433、8页。

人感到该书不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而好像是一部政治宣传品，虽然该书堆砌了大量的资料，但该书并不遵守史学的学术规范。

历史学本身是实证之学，历史研究的生命力在于证据，历史研究必须言之有据，每一说必须有文献或史料依据，即“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

笔者手头有一本商务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台湾学者吴铭能的史学著作《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件与研究》（以下简称《角落》），书中作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以下简称《手迹》）和台湾《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初稿》）进行了校勘和评述，作者以冷静客观的态度，用“绣花针功夫”对《手迹》中梁启超信札影印原件和《初稿》中引用的梁启超信札，做了细密校订比对，一一考辨，在此基础上，对二书的所长和瑕疵进行剖析梳理，指出二书的所长，收到了互相补充，相辅相成之效。同时，又直言指出了《手迹》中的重要“语病”，对《手迹》前言说梁启超对共产党“有许多污蔑之词”，并不认同。但《手迹》“保持原貌，未予删节”。而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初稿》对梁启超“批评国民党部分，做了许多篡改涂抹。不惜扭曲史料，却是吾人所无法苟同的”。²⁴作者这些评述平和中立，体现了台湾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学术良知。恰与《忠奸人》形成鲜明对照。

《忠奸人》前面部分，还摆出一副证据考证的架势，堆砌了大量资料对比和分析。但却回避证明效力第一位的原始物证。到了后面部分则完全不讲证据，信口推论、假设，胡编乱造。完全不讲学术规范了。

《忠奸人》作者口口声声称“对历史事件真相的探索和研究，不应成为现实政治需要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的附属品”。（第5页）而通观《忠奸人》全书的行文叙事和逻辑推论，恰恰更像是“现实政治需要的工具，或为政治服务的附属品”，因为《忠奸人》通篇带有强烈的对中共敌视的口吻和情绪，作者完全还停留在国共对垒时的敌对思维模式中。

《忠奸人》不仅没有证据就认定刘少奇是叛徒，而且还没有证据就信口攀连许多政治人物历史问题。

王光美因刘少奇案的株连，被专案组定为美国战略特务，文革后平反。在没有新的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忠奸人》的作者找出一封戴笠给郑介民的信，信中谈到要派遣王先生“与美方人员合作，接近奸匪”。据此，他就穿凿附会认为王

²⁴ 吴铭能：《历史的另一角落—档案文件与研究》第38-45页。

先生可能就是王光美，断言说：“以笔者对王光美的研判，坚信王光美与当时军统有很大关联”。（第430页）

伍豪事件是国民党陷害周恩来的案件，已被现有证据确凿证明。但《忠奸人》的作者又在书中又翻出此事。“周恩来在这里在这个问题（指伍豪事件）上也是有其难以解释的疑点”“伍豪事件的内幕真相，不是中共一方说了数，而是待关键当事人张冲的日记或国府的相关档案解密时候，就会真相白于天下”。（第339页）

《忠奸人》的作者还质疑彭真、张洁请夫妇的历史。张1933年被捕关入南京监狱，数月后被保释出狱。1937年张与提前出狱的彭真结婚。文革中，彭真被定为叛徒，文革后平反。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该书作者在书中也将此事重新翻出，质疑他们是否签自首声明或悔过书才出狱的？“彭真夫妻和刘少奇一样，对其出狱问题都是说不清楚，讲不明白，疑点重重”。（第260页）

上述捕风捉影、凭空揣度、任意捏造那里是什么“深入的文献考证”和学术研究，更像是《忠奸人》的作者在接受、接续文革专案组抓叛徒的未竟事业。

令人吊诡的是，《忠奸人》的作者一方面死死咬定刘少奇是叛徒的同时，又以“康生不是叛徒”为题，用了一小节的篇幅来为康生的历史洗刷和辩白。（第415页）这是令人回味的。

《忠奸人》作者一方面写道：“中共御用文人总爱吹嘘中共地下特工如何厉害，到处渗透，将国民党特情说得一钱不值……罔顾事实到了肉麻程度。”（第407页）另一方面却对戴笠、叶翔之推崇备至，反倒是“罔顾事实到了肉麻程度。”该书作者称：戴笠是：“数百年历史上罕见的情报人才”，“有非凡的情报工作能力”，“拓展情报网络能力超强”，“不到两年，就能在国土广阔的印度建立遍及到乡村的情报网络”。（第407-410页）其实戴笠当时在中国也没能“建立遍及到乡村的情报网络”，²⁵遑论远在喜马拉雅山那边的印度。该书的作者可能想，反正印度人也看不到此书，不会跑来揭穿谎话，就尽管吹吧。该书还说：戴笠死后，“中共通宵达旦庆祝，周恩来说‘解放中国提前了十年’”（第410页）（周何时何地讲过此话？）

²⁵ 国民党军统首脑唐纵1942年8月23日日记写到：“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年。

《忠奸人》作者还吹嘘军统“后起之秀”叶翔之的台湾情报机构如何运用“反间计”“宣传战”介入文革的：文革时，叶利用“毛泽东的多疑性格”，“编造假证据，写检举、密告信”给毛泽东、康生，指控大批领导干部“搞阴谋活动”，毛泽东收到的“叛徒情报”“其实都是国府情报单位暗中搅局，实施心理战的结果”“多疑的毛泽东果然中计”。（第419页、第“420”页）

叶还在造反派中“趁机吸收、运用大批人员，有的混入基层领导，有的混入红卫兵，有的在国府特工带领下成立新的造反派组织，成为红卫兵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猛烈的中坚力量”在文革中“上下其手，兴风作浪”，致使大批领导干部被清洗，甚至死于非命，“国民党报了昔日一仇”为当年在镇反运动被杀国民党人员“堂而皇之报了仇”。毛泽东为此感慨道“还是将台湾留给蒋介石吧，他搞特务活动行”。（第319页、低441页、第421页）（毛何时何地讲过此话？捏造！）

台湾情报机构究竟如何介入了文革？

文革中曾发生过几起震惊全国的大案。

其一是“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1967年10月上旬，有人在分别在北京多处投寄署名“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信件，对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攻击，并且希望蒋介石反攻大陆。11月下旬案件被侦破，作案人为天津一煤球厂工人沈剑云，沈历史上有瑕疵，被管制，为发泄不满，制造混乱，制造了此案。沈犯供认“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没有任何人参加。”但案件侦破后，陈伯达、谢富治等继续追查后台，诬陷朱德、李富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酿成冤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²⁶

其二是“007密令”案。该案是诬陷周总理搞政变的大案。一九六六年冬，有人在长沙发现一份周恩来签署的：兹定于在12月30日起事的密令。湖南“湘江风雷”即派人飞到北京，向中央文革陈伯达等密报。新北大公社将有关调查材料报送周恩来。事后查明，所谓的“007密令”系“湘江风雷”头头编造的谎言，为此，“湘江风雷”的头头叶卫东（东初）获刑13年。²⁷

²⁶ 刘坚夫：《“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案侦破记》，胡耀邦信息史料网，《历史的审判》（下）第100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

²⁷ 文革中“007”密令事件，《北京大学文革史榷》，胡宗式、章铎著；《历史的审判》（下）第“422”页。

以上这些轰动一时的大案均为大陆内部人员所为，与台湾情报机构没有半毛关系，哪里看到“国府情报单位暗中搅局，实施心理战”的影子？

至于叶翔之在造反派中“趁机吸收、运用大批人员，有的混入基层领导，有的混入红卫兵，有的在国府特工带领下成立新的造反派组织，成为红卫兵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猛烈的中坚力量”，在文革中“上下其手，兴风作浪”更是无稽之谈。

北京的五大学生领袖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王大宾及其麾下的新北大公社、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北师大井冈山、地院东方红等均为“红卫兵中态度最坚决，行动最猛烈的中坚力量”，他们哪一个是台湾情报机关“趁机吸收、运用”的人员？“国府特工带领的造反派组织”又是哪一个？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败逃台湾，孤悬海岛，六二年窜犯大陆，又遭迎头痛击，惊魂未定，苟延残喘，所谓“反攻大陆”已成呓语。他们哪里还有能力对大陆进行“上下其手，兴风作浪”的反间计、心理战呢？“无可奈何花落去”，《忠奸人》对台湾情报机构的虚夸吹捧，实则是对国民党在大陆惨败的掩盖和涂饰。

任何一位经历了文革的人都可以判断《忠奸人》作者的上述说法可信度有几何？

《忠奸人》对中统首脑徐恩曾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吹捧：“相比美苏情报机构……中统的层次和手段起步都较高”。“徐恩曾最擅长的就是策反、吸收和渗透”。“抗战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自中央，下至省委都有内线，对中共动态了如指掌。”“国民党特工组织渗透延安，而且是高层，根本也不是什么秘密”。

（第365页）既然，国民党已渗透延安高层，为何蒋介石侍从室六组组长、情报主管唐纵却说，在延安我们一个内线也没有呢？

逃亡台湾的徐恩曾还虚张声势：“我更关怀现正潜伏在大陆赤区的许多战友，虔诚地祝福他们能安全无恙……期待他们那套干练精准奇巧妙的战斗经验，有一天能做出比过去更大的贡献……究竟最后的笑属于谁”（第365页）（365页）这些话恰如夜过坟场吹口哨一壮胆。

《忠奸人》的作者对戴笠、叶翔之和徐恩曾无以复加的吹捧，对中共的强烈敌视，令人怀疑他不就是台湾国防部情报局的代言人吗？这一切莫非还是当年国民党“反间计”“宣传战”的下半场吧。

三

要全面详细评论《忠奸人》还是有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陆相关档案资料大多尚未开放，难以将各种资料加以详细比对、校勘和考辨。另一方面，台湾方面档案资料的运用也存在问题。据说，台湾的档案开放度很高，但从《忠奸人》对档案资料运用的来看，要打折扣。

《忠奸人》作者说：大陆的有刘少奇的著述“充斥着道听途说，胡乱揣测，经不起推敲的荒谬之言”，所以“我们要听听中共老对手——国民党的声音”，一方面说叶翔之的“专案报告”“可信度极高”，“本书引用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叶翔之的这份报告和审查意见”。（第9页）。另一方面又说，叶的报告关键部分“至今仍未解密”（“仍未解密”你是如何看到并引用于该书的？）推脱、不敢将叶翔之的这份“专题报告”全文公布，附录于该书，供读者鉴察。

《忠奸人》作者称赵恒惕日记是刘少奇长沙被捕案的重要物证，一方面说他查阅过，另一方面说，之后“被列为密件”，又不能查阅了。

《忠奸人》作者说，张学良的证词是刘少奇奉天被捕案叛变的重要证据，一方面引证了叶对张学良的访谈，称是“最珍贵的”，另一面又说张的档案尚在保密中，“无法得悉全文”。（第428页）

《忠奸人》作者一方面大胆断言说刘少奇1933年曾被密捕，另一面又说，国民党相关档案“仍未到解密时间”。（第27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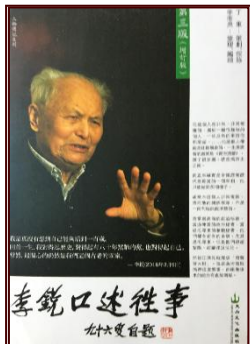
《忠奸人》作者一方面说周恩来在“伍豪案中有疑点”，另一方面又说，“相关档案解密的时候，就会真相大白于天下”。

《忠奸人》作者一方面说，戴笠的“日记、公文至今大部分仍没有解密”，另一方面又说，他就王光美案“查阅了数千封戴笠生前公文”（第411页）（既然没解密，又何能查阅“数千封戴笠生前公文”）。

《忠奸人》作者对档案资料这种需要时可任意查阅，需要举证时则以保密为由拒之门外的状态，不禁令人生疑，那些深藏于密室的密件档案到底有什么？或许什么都没有，真相永远封闭于密室。这或许就是《忠奸人》作者故弄玄虚所期望的吧。

总之，从资料的运用、行文叙事和逻辑推导来看，《忠奸人》都很像是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品，它与学术研究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不属于同一类事物。■

【评论】



废除宪法，去了美国的魂；再用 1619 年第一个黑人到达美国作为历史开端，废除美国独立宣言开创的美国史，算除了美国的根；中小学校移除宗教课程，废了美国人心中上帝。三根齐废，美国灭亡，左派在这块富裕的土地上重新建国。

——摘自何清涟推文

“状告海关案” 跟进报道 (79)

——美国民主党的中共特质

李南央（美）

1月20日，第59届总统乔·拜登的就职典礼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宣誓的平台看下去，广场上插满了代表20万死人的旗帜，没有人民；沿街布列了2万5千名戎装的国民卫队，没有人民；环绕国会大厦架设了两层顶部带刺网圈的高高的屏障，人民被视为可能的“暴徒”不被允许夹道迎接新任总统入主白宫。这是经典的执政共产党的特质——**惧怕人民**，因为它的地位不具合法性。很多精英及主流媒体，一直到今天还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此次大选根本不存在舞弊”的说辞。但是1月20日军警密布，严防民众的肃杀的“庆典”，明白地揭示了真相：拜登和他的幕僚们并不以为他是超过八千万美国人民合法选出的总统。

在2万5千名国民卫队成员被紧急调至华盛顿后，国防部和联邦调查局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背景审查，12名军人因“思想倾向”或有“可疑行为”被踢出。这是共产党的特质——**军队效忠于党**。而当就职典礼完成后，五千名士兵被踢出国会，露宿停车场，共用一个只有两个厕位的洗手间，一个电源插头。这是共产党统治下军人的地位——**供党领袖驱使的奴仆**。我在第二天的ABC新闻中看到，“第一夫人”慰问国民卫队，边从提着的篮子中取出饼干送到军人手里，边说：“感谢你们保卫了我的家庭”。党卫军成了乔家卫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美国联邦政府注册专网(www.federalregister.gov)记录，1月20日就职当天，拜登签署了9条总统行政令(executive order)，翌日又签署了8条；据CNN

报道，拜登就职六天内，一共实施了 33 条行政行动 (has taken 33 executive actions in six days)。而川普总统在他就任的第一天仅签署了 1 条行政令（暂停实施奥巴马医保计划），就职六天内，共签署了 4 条行政令。哪位总统将自己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置于立法、司法另外两权之上，是不言自明的。前者展现的是执政共产党的特质——**我即法**。

美国国父们设立的治国框架是小政府，他们不允许政府将手伸进国民的腰包里去掏钱，然后由自己支配。川普总统在位四年，尊崇这一原则，除了降低个人所得税外，将前任留给他的 3 万 8 千页行政法规减少到 2 万 1 千页，大大缩小了政府的管控权，美国经济得到骄人的腾跃。而拜登刚一上台，即反川普而行之，重新扩大政府权限，突显了他的执政共产党的特质——政府掌管一切。凡共产国度的政府都会对人民说：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公平分配社会财富。结果是一切的资源、财产，统统归执政党所有，其实就是归了党的老大。拜登政府即将开始的对富人的增税，本质就是将部分国民的部分劳动所得，硬抢到政府手中去实现政府以为的美好环境和平等社会。但是怎么就不问一问，既然讲平等，为什么 51% 的人口必须缴纳个人所得税，而 49% 的人口可以不纳税？为什么政府可以随意加税，而纳税人没有争辩抗税的权力？非但如此，工作越努力，所得越多，政府对他们的纳税额度越高。这公平吗？！如此下去，多劳受罚，不劳而获；政府大把大把地将纳税人的钱撒到损伤美国利益的国内外项目、组织，美国不完蛋才有鬼！

民主党和美国“精英”们攻击川普总统的最大“罪状”之一是：川普激化了社会矛盾，分裂了美国。而民主党是要维护弱势群体，如黑人、同性恋、变性人、非法移民，等等的利益，将美国建设成一个世界各族裔共享的“大家庭”。拜登竞选时挂在嘴边的话是：我们要的不是一个民主党或是共和党的美国，我们要的是一个团结的美国。但刚刚上任几天，我们便看到民主党和它的支持者们将已经实施的对相左言论的封杀变得更加没有底线，并开始毫无忌惮地宣称：要将川普的支持者们关起来，把他们的子女送进再教育营。这还不算，民主党国会议员中更有人提出，要将他们认为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定为“国内恐怖主义者”。这已经是比肩中共在新疆对维族人的种族灭绝行为了！拜登本人明确表示完全赞成弹劾已经成为平民的川普，尽管自己知道不可能成功。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共产党的特质了——**说一套做一套**。不妨举一个例子：中国共产党在野时喜爱的一首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向着一切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而在它执政 71 年后，这歌是根本不能唱了，老百姓不能公开地讲“团结”，得说“抱团取暖”。

1 月 26 日，FBI 逮捕了“离开民主党运动”（Walk Away Campaign）创始人 Brandon Straka，罪名是他参与了 1 月 6 日的冲击国会大厦。而他当天只是站立在大厦外面的平台上并没有进入国会大厅，也没有任何暴力行为。这位曾经坚定的民主党党员是一位同性恋。越裔美国记者，越南难民的后代 Andy Ngo，因为报道安提法的暴行，被安提法成员当街殴打，他的律师提供了现场录像及施暴者的信息，FBI 置若罔闻。在他的新书《揭秘安提法摧毁民主的激进计划》（Unmasked: Inside Antifa's Radical Plan to Destroy Democracy）即将出版时，安提法对他的死亡威胁愈加猖獗，当局依然是绝不作为。1 月 25 日，他被迫离开波特兰市，逃亡伦敦。本属于民主党最为维护族群——同性恋、难民后代中的这两位成员的处境，明明白白地揭示了民主党的共党特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所以，我们大可删去团体或政党前面的那些定语：左的、右的，激进的、保守的，民主党、共和党，反川普、挺川普……无论哪个团体，只要它将自由民主的理念与自己团体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就一定会在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放弃自由民主。作为每一个个人，我们一定要看明白：人类走到今天，只有由那些认同自由与民主是不变应万变的制度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才会把你的利益永远置于它的团体利益之上，才是你可以信赖和依靠的。

《李锐口述往事》最后一句话是：“七十岁时，我作的自寿诗中有一句：‘应借覆车追往事，仍须放胆写文章。’这两句诗就算是我的这个口述回忆的结束语吧。”美国不缺少研究共产国家问题的学者，美国大学里更是有不少专门讲授中国历史、中共党史的教授。可在美国生活的这三十年中，我只看到川普总统任命的国务卿彭佩奥先生，将美国的外交政策清晰地分拆为：对中国人民的，对中国共产党的。真是非常地希望美国研究“共产国家问题”的“精英”们，研究“中国问题”的“精英”们，能够将你们的研究著述作为一面镜子，照照现如今美国民主党的言行。中国的覆车之鉴，实实在在是美国的“精英”们应该教授给年轻一代的、必须记取的血的教训。👊

2021年1月31日

【序跋】

师大女附中《教育叙事》无序之序

王本中（主编）



2017年，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现名附属实验中学）的多位校友，在百年校庆即将到来之际，写了一本名为《教育叙事》的书。这本沉甸甸的书，凝聚了她们很多心血。我很为她们对母校的深情所感动。一所中学，沧桑百年，这在我们这片国土上，并不多见。承蒙同学们不弃，请我做主编，要我为书作序。我想，恭敬不如从命，就拉拉杂杂随手写下这些话。

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女子中学，1917年3月成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须办女子附属中学，是民国教育总长蔡元培先生首推，是为实现全民教育，达到教育强国目的而做出的特别规定。从此，中国女子才能真正系统地接受正规教育，成为新时代的女性。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是留日学生欧阳晓澜女士。我们应该记住这位创办者和奠基人的名字。

1931年，学校正式归属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校名始定。1932年，时任师大校长的黎锦熙，为女附中题写校训“勤肃信毅”，新式女校建校十几年后有了办校宗旨和校则依归。近百年来，一批批献身教育的智识精英，先后走进这所学校，为授业解惑、笃志树人而殚精竭虑。他们培养的学生，也有些毕业后毅然留校，承继前辈的事业，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师大女附中随着时代变迁，隶属关系、校名校址也屡有调整，但大格局和老传统始终未变。直至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校名仍为“师大女附中”，却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是1963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那时一切听从党的安排，是我们的信条。我放弃做一名“华罗庚式的数学家”的梦想，到北师大实验中学的前身——师大女附中任教，一干就是40年，直到2003年退休。也许是身处激烈变

革特殊时期的缘故，这40年的教育生涯，留给我的记忆，是12个字：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言难尽。

1963年中至1966年初，对我来说是充满阳光的30个月，也是我非常舒心的30个月。那些岁月，尊师重教，教学相长，师生之谊，绵长悠远。

1966年的4、5、6三个月，“四清”运动波及女校。风起于青蘋之末，我赶紧主动向我做班主任的高二（2）班学生，就“白专”道路作了“深刻检查”，希望得到同学们的批评，并重新赢得党的信任。

接着是“文革”狂飙突起的“红八月”，那段时间发生的一幕幕惨剧，像一场噩梦，至今想起，还令人心悸。胡志涛校长被打断脊骨，卞仲耘书记更是被群殴致死。原工作组时期的革委会成员刘进等人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报告，得到的回答竟是“死了就死了……”。我后来听说这个情况，不禁愕然惊悚。一个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共产党员，被学生活活打死，这么惨烈的事件，市级最高领导竟给予如此冰冷的回应！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到底是怎么了？虽然这一念头转瞬即逝，但由此，也让我的思想发生微妙变化。

我暗自思忖，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的老师、校长都是牛鬼蛇神吗？

我们常说“无条件地服从党”，“做党的驯服工具”，“做共和国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现在，全国乱成一团，我们还得无条件地服从指令，去乱上添乱吗？

学校，是一块培养心灵和塑造灵魂的净土。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虽然有着必然的联系，但毕竟不是政治，不是经济，不是文化，而是具有独立品格的另一个领域。教育成为政治的附庸，沦为政治的奴仆，岂不是要把青少年纯真的理想、炽热的激情引向歧途，引向恨与仇的深渊！

我们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吗？当然不能。

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

必须反思，必须深刻反思！

这本书不是由局外人在对当年各个学科有关资料进行寻找、收集、整理后撰写而成，书中的每位作者都是“文革”前曾经在这里就读的学生，她们都不是专业的教育学者，但每篇文章都渗透着她们对教育、教学的重新认识和思辨，尤其是充满了深刻的反思。这就让人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女附中的一些同学，已走得

更远些。她们不仅深刻反思了她们在文革中的作为，而且以实际行动，为卞仲耘校长塑像，并公开向受害的老师们表示了道歉和忏悔。我以为，这是不可小觑、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也是我愿意担任主编并为本书作序的最根本的原因。

著名教育学家顾明远先生对于这个学校和这本书，给予了这样的评价。他称女附中为“中国女校之先锋，培育新女性之摇篮”。提到北师大附中和北师大女附中这两所学校是我国最早的现代国立中学校，“在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中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尤其是北师大女附中，是我国最早的国立女子学校，培养了大批中国新女性。”

他还说：

“中学时代对人的一生来说，是奠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重要的时期。我想许多北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也会有这种回忆。……”女附中“有百年历史，传承历史，以史为鉴，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教育叙事》虽然不是一部校史，但它记录了从1917年建校，尤其是1949年到1968年招收男生前半个世纪间女校的教学、教育。这无论对于保留历史遗存，还是以史为鉴，对今后的学校发展都是会有重要意义的。”

当今社会教育资源的配置多有不公。无须讳言，女附中/实验中学在中等教育体制中，始终处于“宝塔的顶尖”。正是由于资源充沛，这样的学校对社会的责任也就更重。本书既有具“精英”学校“特色”的内容，也包含大量对中学教育带有普遍参考价值的材料。无论哪方面，它们或许都能对当下社会有所启迪或警示。

书中特辟了一章讲述女附中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提到当年“阶级路线”的贯彻执行，这章不但大量引述原始资料，也收入了一些学生的回忆与反思。可以说，这个专题在本书中最为独特，也是本书中最为坦诚无饰的。这也是作者给母校留下的具有当年时代特色的史料。

至于我本人，也有一点想法和同学们分享。我觉得，我们这代人，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必须坚决地、彻底地抛弃“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所谓“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是建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基础上的邪恶哲学，是毁灭哲学，必须视之如蛇蝎，弃之如敝屣，与之彻底决裂。斗，其乐“无”，其途“穷”，斗来斗去，斗来的是穷困潦倒，是穷凶极恶，是穷途

末路。这是已被历史证明了的一条铁律。

我们已经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平发展”之路！

我们要化对抗为合作，化冲突为和合，化干戈为玉帛。不延续恨，不积累仇。让善扎根心灵，让美撒遍大地，让爱洋溢人间！

是为无序之序。☞

2023年1月

【序跋】

《教育叙事》自序

本书撰稿人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教育叙事》（以下简称“叙事”）是几位年逾古稀的女性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她们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简称为“师大女附中”（以下简称“女附中”）。

女附中，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是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名校。她创立于中国社会变革、现代教育启蒙的1917年。当时的校名是“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校”，后又经过了几次易名，1948年10月使用的名称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1949年后使用的名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和“北京实验中学”。

女附中自建校后一直是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中学之一，1955年还是全国唯一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学。自1949年后政府实行重点中学制度后，女附中就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

另外，女附中耀眼之处还在于她的“红色”。1949年之后，来自解放区的华北育才中学女生部并入女附中，给她的底色开始注入红色。接着，许多第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干部的女儿们进入该校学习。从此，“红色”更加耀眼。

本书主要讲述的是该校在1949年至1966年期间，几门课程的教育教学情况，即着重于“文革”前的十七年。

“文革”前“十七年教育”体现了新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冲突、价值和特质。其主要特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全面移植苏联模式；规定“教育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特别是阶级斗争以及革命接班人的教育。由于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使当时尚处于求知时期的中学生们对“革命”“政治”“阶级”“阶级斗争”的认知有着特别的热情与偏爱，甚至有些畸形和盲目。

当一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的政治运动爆发时，这些中学生们喊着高亢的口号，带着激昂的情绪投入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他们做出了一些狂热的、荒唐的、错误的行为，有人甚至实施暴力，对公民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而发生在女附中的“八五事件”就是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

1966年8月5日，被认为是“走资派”的党总支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在校园内被学生殴打折磨致死。这是“文革”初期发生的一起引人注目的暴力事件。

为什么一群出类拔萃的女生会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原因很多，但与她们所受的教育肯定有关。这是我们选择对曾经受过的教育进行研究的最初考虑。

时间来到了21世纪，当年的中学生已经走过了自己的青年、中年，开始步入了老年。随着社会的发展，年龄的增长，知识的增加，对历史和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我们开始对自己所经历的过往进行思考，尤其是对发生在女附中校园的“八五事件”进行反思。“直面历史，拒绝遗忘”是我们在反思中提出的口号。

许多校友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思考，并写下了许多文章。2007年，校友们发起募捐，为卞校长树立纪念塑像，以示纪念、反思与警示。2014年1月，我们终于有机会与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们坐在一起，向他们真诚地表示了歉意，为我们当年的无知、鲁莽、偏激、错误，尤其是没有法治观念，向他们道歉。在女附中（实验中学）百年校庆之前的2016年，我们将自己编写的有关怀念母校和反思“文革”的文章编写成一本书——《远去的女附中》准备出版。后又将更多的文章和资料编辑成“岁月女附中丛书”三本：《口述春秋》《教育叙事》和《史料文存》，作为献给母校百岁生日的礼物。这几本书受到了许多老师、校友的好评，社会反应热烈。

遗憾的是，这几本书并未能正式出版。

令人欣慰的是，有关女附中“八五事件”的回忆、反思与争论的一套三册书终于在2020年8月由华忆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本书的出版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于是我们期待对原来的《教育叙事》进行修订后交由华忆出版社正式出版。

建议一出，原作者们尤其是原主编王本中老师积极响应。于是就有了这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教育叙事》。

这本书主要的内容是结合我们的亲身经历，对女附中十七年教育的几个方面做一梳理和总结。根据我们的能力和目前的资料等情况，我们仅选择了六门基础课程：语文、数学、政治思想、劳动教育、体育、音乐，进行了专题研究。参考文献包括学校的档案资料、工作笔记，还包括现有的研究成果，如公开发表的文章、著作。此外，我们还克服困难进行了口述访谈。在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我们经过认真的分析，力求对那个时代该校的教育情况做了客观、详细的描述和总结。至于如何评价这十七年的教育，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初步的，尚未做出成熟的结论。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留下一些资料，供后人研究。

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尽量做到客观、全面、资料翔实，注意使用原始资料。

本书共七章，前六章为对不同课程教育的论述和研究。考虑到1949—1950年为新旧社会的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教学有其特点，于是增加了第七章。

除第五章“音乐课的集体记忆”外，其他各章均由一位作者单独完成。

本书称为“叙事”，旨在较全面地描述上述几个方面女附中的教育教学情况，包括教师对学生成长的影响。同时揭示那个时代教育的特点、效果及对学生成长的影响，以及其中的问题。

本书并未采用统一的体例，而是由撰稿人选择自己擅长的写作方式，但注意了学术性和资料性。

本书的独特性在于三点。其一，本书作为“红色文化”系列研究中的一本，选取女附中教育作为个案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女附中可以作为十七年中学教育的典型代表。其二，本书所有的撰稿人均为女附中十七年教育的亲炙者，也是女附中“八五事件”的研究者。其三，本书的研究还具有女性的特点。研究的内容是女子中学的教育，撰稿人也全部为女性，我们研究的视角会或多或少带有女性的特点。因此，我们所讲述的本校教育，不但是理性与感性的自然结合，而且具有强烈而明确的反思性质。这可能是我们做同类研究的天然优势。

女附中是历史的产物，她的每一段经历都离不开她所依附的那段历史。教育反映的不过是历史的一个侧面。我们做这项研究的初衷是，真实记录女附中在那个时代（1949—1966）的教育情况，指出这种教育思想的旧弊沉疴，为中国将来

的教育改革和未来的发展提供经验和教训。这或许也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逐渐老去的时候，为后人留下一些记录了我们那个时代的文字，供他们研究参考。

必须承认，本书的写作过程异常艰难，主要是作者们大都没有做过学术研究，没有教育学研究的学科背景，但是我们努力在干中学，想尽办法查找原始的教学档案，走访老师和校友，收集原始资料。从图书馆、中国期刊网等网站收集参考文献，然后对这些文献资料进行分类筛选。尽管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甚至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选择了坚持。一路走来，有汗水，有泪水，有感动，也有收获和喜悦。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除撰稿人之外，还有很多校友参与了本书的编辑及校对工作，还有些校友对本书的完成做出了贡献。她们是：王民培、郭莲莲、高忆陵、于羚、陈琨、郝新平、叶维丽、黄光光、许容、牛立。在此向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另外，还要感谢那些帮助了我们的老师们和校友们。

在《教育叙事》的写作过程中，实验中学也给予了帮助和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我们的谢意。最后，还要感谢华忆出版社的编辑和朋友们，特别感谢启之先生一直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坦率地讲，我们撰写这本书还有一个目的：揭示十七年教育与“文革”的关系。但是，由于这方面的参考文献明显不足，国内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著，档案资料也开放不够，加之我们水平有限，目前还达不到这一目标。但我们希望这本书能给后人的研究带来一些启迪，留下一些资料，期望他们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本书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真诚地希望读者朋友们不吝赐教。❏

2023年2月4日（立春）

【序跋】

《教育叙事》后记

本书撰稿人

当这部师大女附中“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叙事》即将出版之际，当所有的辛苦和挑战已成昨天时，我们不禁想起七年前。当时王本中老师提出，让我们写一本女附中的《教育叙事》（时间框定在1948——1968），当时真把我们难住了。是论说文还是记叙文？关于时代变迁与社会进退，我们如何评价？关于母

校的教育历程与前世今生，我们又知道什么？这不是一般的挑战，是对我们学养和能力的检验。

首先要感谢王本中老师，时间已经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深谋远虑。作为女附中的老一辈校长，为了让我们树立信心，他率先行动，与时任校长蔡晓东商议沟通，开放学校的有关档案，提供远期资料，为写作创造基本条件。同时，也在这里感谢蔡晓东校长和给我们提供帮助了的老师，没有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我们的写作将一事无成。

我们这个小组，以老三届校友为主，还有三位“文革”前考入大学的学姐，分别是：王民培、郭莲莲、高忆陵、刘进、朱晓茵、于羚、陈琨、罗治、郝新平、鲍园园、黄光光、许容、叶维丽、冯敬兰、牛立和李红云。2016年盛夏，在高年级学姐们的带领下，开始了一头水一头汗地翻拍学校的教学档案、原始资料，去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北师大查阅资料，浏览相关网站，走访老师和校友，召开座谈会等等，为各科的写作准备充分的历史资料。冯敬兰、朱晓茵、罗治、李红云、刘进分别担任了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劳动课的撰稿人，牛立担任了音乐一门的组稿人。郝新平和叶维丽为自印本《教育叙事》写了精彩的两篇序言。而没有参与写作的各位，都担任了文稿的校对和最初的编辑。

有些校友没有参加与本书有关的写作或编辑工作，但是她们作为被采访者，坦诚说出了她们在母校实行阶级斗争教育的严酷环境里，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我们特别感谢张立雄、周静、孙行玲、宋晓燕和杨正宜校友，为历史留下记忆。

作为本书作者，我们在写作过程里，不断地与老师们在往昔岁月里相遇，他们的学识、远见和品格，照亮了尘封的历史。在数万张翻拍的资料图片中，我们仔细辨认他们几十年前留下的教案和心得，那些用蘸水钢笔写的繁体字，展示了沉默的力量，一次次鼓舞着我们。有了老师们的诲人不倦，才有学生的智力开发和精进成长。他们学为人师，行为垂范，薪火相传，成为一支作风强健、能力超群的队伍。是他们奉献的心血和智慧，成就了母校的辉煌，培育了一代代优秀的学生。于是，我们尽可能把老师名单附在每一章的后面，让后辈感谢他们，让历史铭记他们。

如果说语文是一切课程的基础，是表达情感和想象力的艺术，更是时代变化的晴雨表，那么，从算术题“ $1+1=2$ ”到“数学是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科

学”，数学早已成为现代文化的精彩华章。体育和音乐，既塑造学生的体魄，又修炼她们的灵魂。女附中对劳动课的重视，彰显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同样，贯穿六十年代的阶级斗争教育，则真实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动荡和政治领域斗争的残酷，无疑是时代的一面镜子。综上所述，我们分七个章节做了回溯和记录。

《教育叙事》是我们集体回赠母校的礼物，希望时间来检验，希望历史会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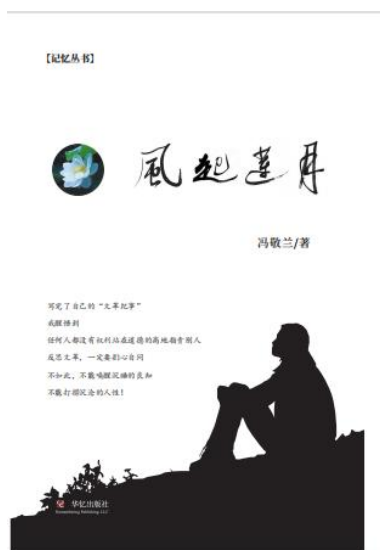
2023年2月

【序跋】

《风起莲月》作者后记

——2014：虐心的写作

冯敬兰



我很久不更新博客了，因为打不起精神。偶尔看一眼，发现每天仍有上千网友浏览，这让我非常惭愧。

有次看到一位网友留言：你怎么不写文革了？我答：专栏写完了。后来他又说：我喜欢看你写的文革，接着写吧。很感谢像这位网友一样，一贯支持我的朋友、读者和网民。可是，我真的写完了。

年初，“宋彬彬道歉”的新闻引发了网络热议，一位年轻的网站编辑拿着合同书找上门来，邀请我在网易新媒体开个文革专栏。架不住网易的开放和女编辑的执着，我觉得机会难得，不知深浅地答应了。没想到一篇一篇地写开去，竟让我停不下来。

在2014年前三个季度，我哪里也没去，什么都没干，整天窝在家里看资料，都是文革时手抄的大字报、传单、检讨书、告发信、批判稿、日记、笔记的复印件或电子版。然后，按部就班地梳理，那些陈年往事一幕幕展现在我的眼前，同时也唤起我的记忆。我以每周一篇的速度开始了《我的文革纪事》。我虽多年从

事业余文学写作，但文章中涉及的事件、情节、细节无一来自文学想象和虚构，全部有据可查，有人可证。

我不能不说，这种写作很痛苦，是连续的虐心过程。我在文章中时有流露，写到某个场景，某个细节，我会不由自主地泪流满面，甚至多日抑郁而不能自拔。我原本不知失眠为何滋味，在写这些文革旧事时，寝食难安成了家常便饭。焦虑、抑郁、烦躁、易怒，种种坏情绪一直伴随着我。结束了专栏写作，我本想把所有篇目重新整理、校正，作为书稿暂存，可是身体的不适让这件事无法进行，心动过速，心律紊乱，血糖升高，短暂失忆，全袭来了。我开始理解美籍华人女作家张纯如，为什么在采访和写完南京大屠杀后，饮弹自杀。我暗暗发誓，今后再也不写这类题材了。

以上文字写于2014年12月。光阴荏苒，时间来到了2022年12月。

几年来不断有好友催促我将散落在网络上的文稿结集出版，留给后人。我说今人都不再读“纸书”，何况后人？有文章在网络上流传就够了。实际上时过境迁，网络上关于文革的各种文章基本都被屏蔽了，我发表的几十篇也所剩无几。翻阅旧稿，发现并无枯燥难咽之嫌，依然具有可读性，依然会自我打动。那就结集做成一本书吧。

作为文革亲历者，我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详细梳理了母校北师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发生的事件——1966年8月5日的校长之死和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戴袖章。2007年9月母校90周年校庆后，二者成为大众传播事件，网络上争吵不断，压倒的声音是宋彬彬带领红卫兵打死了校长，甚至还有学者把“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这样耸人听闻的传说编进个人的“文革年谱”。我实在看不过去，写了《请放开宋彬彬》一文，于2007年12月13日15:56发在我的搜狐博客“看了又看”上。宋彬彬是我的校友，1966届高中生，此前我从来没有和她说过话，模糊记得她是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的瘦高个儿。文章一发，就像在沸水里扔了炸弹，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网暴。我天性不怕事，干脆加入了校友们的文革事件调查中去。因此，我写文革纪事始终得到了她们的支持。根据我的日记，还大致理清了从1966年6月文革开始到1968年6月远赴北大荒的两年里，我所经历的校园生活和心理历程。8个月的写作，一共写了30多篇文章，其中《我的文革纪事》24篇，全文刊登在门

户网站网易的新媒体上，其他篇目分别发在共识网和搜狐网。

话说回来，写完了自己的“文革纪事”，我醒悟到，任何人都没有权利站在道德的高地指责别人，反思文革，一定要扪心自问。不如此，不能唤醒沉睡的良知，不能打捞沉沦的人性。☞

2014年12月—2022年12月，于北京

【资料】

清华大学文革资料选登

关于对团派和 414 双方分歧的调查报告

最高指示

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

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

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关于对团派和 414 双方分歧的调查报告

1968.4.1

一、对清华 17 年来的估价：

团派：

清华大学是中国赫鲁晓夫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是用来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据点之一。清华 17 年来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是一个烂掉的单位，是一个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而清华的党则是一个修正主义的“秀才党”，上下都是黑线统治。对于这样的单位，就是要彻底砸烂，就是要大翻个儿！坚决反对红线主导论！坚决反对上黑下红论！

1. 蒋刘高胡何艾结成死党，组成了清华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一些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形成了清华的特殊阶层，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校的骨干力量。
2. 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党内走资派的支持下，成了资产阶级统治我校的“参谋部”，为资本主义复辟出谋划策。而 108 个老教授、副教授则是调节学校工作的“寒暑表”和“稳定力量”，是蒋南翔的 108 将。
3. 包庇重用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其翻案、摘帽，而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4.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学习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大搞和平演变。
5. 反对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科研路线，执行分数挂帅，脱离生产和国家需要，争名誉，争利润，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6. 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权享受，对广大职工进行残酷剥削和迫害。

414:

1. 清华大学是蒋南翔长期统治的独立王国，蒋南翔一手把持的前校党委在旧中宣部、旧北京市委、旧高教部黑线的操纵下，逐步地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把清华大学作为修正主义教育的实验场。
2. “但是 17 年来，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任何人要封锁，不让毛泽东思想和广大干部、群众见面是办不到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清华园。”——“毛泽东思想小组”

我们不但应该看到蒋南翔的作用，而且还应该看到毛泽东思想、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的作用。清华园长期以来就存在着红线、黑线的斗争，不能把广大干部与蒋南翔看作是铁板一块，不能看成漆黑一团。不能对清华的 17 年一概否定，我们反对大翻个儿，反对黑线上下连续论。但是，团派认为我们是上黑下红论，这是对我们的污蔑！

3. 清华大学与莫斯科大学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彻底砸烂。

二、关于对整个清华干部队伍的估价：

团派：

1. 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是要革命的，但不同程度上都犯过错误：

“在我们学校一定要坚定地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一定要在我们的脑子里牢固地树立：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个概念。”——蒯大富

“我们学校干部队伍绝大多数是好的，包括中上层干部 90%以上也是好的。”——鲍长康。

他们的大多数是要革命的，但过去都在不同程度上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

2.要承认清华干部的特殊性，他们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

要承认文艺界和教育界的特殊性，要承认矛盾的特殊性，清华干部必然也有它的特殊性：

他们大都是三门干部，没有经受枪林弹雨的锻炼，而是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里培养出来的，是蒋南翔精心选拔的；

17年来对两条路线斗争没有认识，不能区别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不能区别鲜花与毒草，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

在两个司令部的尖锐斗争中，长期站到了反动路线一边。

他们绝不是左派，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谁要说他们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那纯粹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言论。

3.清华干部大多数是中间派，他们和蒋南翔没有原则的分歧和斗争：

毛主席在谈到知识分子曾说过：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其中除了左翼和右翼之外，中间派是极大多数。而清华的大多数干部是属于这一类。这种人老是被动的，在关键时刻往往要人给他们背上击一猛掌才前进一步。他们在政治上崇拜蒋南翔的，他们根本谈不上与蒋南翔为首的修正主义党委有政治上、原则上的分歧和斗争。在这一点上估计不足，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虫。清华干部一般论是唯心的、错误的。

4.清华干部忠实地执行修正主义路线，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工具，为法西斯卖力：

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17年来清华实行的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专政，是法西斯专政，而广大干部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这一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他们客观上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是替法西斯卖力。”

——“井冈山钢铁连队 1315 班”

5. “基层干部和党员是刘邓路线的社会基础。”“党团员都是黑爪牙，狗腿子”。

“清华是个大黑窝，清华干部全烂了。”——“红教联”

414:

1. 广大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我们的绝大多数党员、大多数干部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我们学校的党员、干部也是这样的，他们是先进分子！这是不容任何人抹杀的，他们的先进面目必须恢复！现在从上到下大多数干部都是犯了严重错误的说法，纯粹是刘邓散布的党员不如团员、团员不如群众的反动谬论的翻版！对这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千钧棒”、“不怕鬼”
2. 毛主席的 95% 的理论仍适用于清华，清华不能例外，广大干部都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毛主席的 95% 的理论仍适用于清华，清华不能例外。在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和各项政治运动中，如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和 62 年以后的反修斗争中，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清华干部的大多数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革命的领导干部！——“干部办公室”、“干部问题串联会”
3. 广大干部执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蒋南翔之流是有抵制有斗争的：无论从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和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表现，或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及本职工作中的表现，都说明广大干部是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是热爱毛主席的。他们执行的基本上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对蒋南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做了顽强的斗争、坚决的抵制。——“千钧棒”、“不怕鬼”对于广大党员和干部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有缺点和错误，但不能像团派那样认为广大党员干部与蒋南翔无矛盾、无斗争。不能把广大干部作为打击对象。

（注：在 414 中，有的战斗组认为广大干部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如《毛泽东思想小组》就写到：“这样一支干部队伍长期以来执行的不是毛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而是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他们在长期执行贯彻修正主义路线中，给党给社会主义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危害，犯下了程度不同的

错误，更有少数人堕落到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中。……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他们。他们既有过去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给党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来损害，犯有错误的消极面；又有拥护党、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愿意起来革命，改正错误的积极面。……对他们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们应当给以严肃彻底的批判；对他们愿意起来革命改造错误的积极面，我们应该欢迎，应该允许人家革命，让他们触及灵魂，改正错误。”)

4. 蒋南翔推行任人唯亲的干部政策，但不能认为广大干部都是替法西斯卖力，而是受黑修养及反动路线的毒害。
5. 《红教联》在干部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反动的。《红教联》是清华极左思潮的根源，而《红教联》的这些反动观点，在团派中有相当市场。我们绝不能把清华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我们必须把那些反动观点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三、在对待各级当权派上的分歧：

1. 分歧对照表

校长、书记、副校长、副书记中

| 姓名 | 职务 | 团派 | 414 |
|-----|------------------|----|--------|
| 蒋南翔 | 校长、党委第一书记、高教部长 | 打倒 | 打倒 |
| 刘冰 | 党委第一副书记 | 打倒 | 打倒 |
| 高沂 | 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高教部副部长 | 打倒 | 打倒 |
| 胡健 | 副书记、组织部长、人事处长 | 打倒 | 打倒 |
| 何东昌 | 副书记、教务处长 | 打倒 | 打倒 |
| 艾知生 | 副书记，宣传部部长 | 打倒 | 打倒 |
| 张维 | 副校长、党委委员、数力系主任 | —— | 打倒（学术） |

在常委委员中

| 姓名 | 职务 | 团派 | 414 |
|-----|---------------------------------|----|----------|
| 李传信 | 常委委员、无线电总支书记、系主任 | 打倒 | 打倒 |
| 李恩元 | 常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人事处副处长、监委副书记、政治部副主任 | 打倒 | 未（内部有分歧） |

| | | | |
|-----|---------------|----|-----|
| 滕藤 | 常委委员、工化系总支书记、 | 打倒 | 打倒 |
| 高景德 | 常委委员、科学处处长 | 打倒 | 打倒 |
| 徐静贞 | 常委委员、图书馆副馆长 | 打倒 | 不打到 |
| 吕应中 | 常委委员、200号总支书记 | 打倒 | 不打到 |

在党委委员中

| 姓名 | 职务 | 团派 | 414 |
|-----|-------------------|----|-----|
| 王遵华 | 党委委员、电机系总支书记 | 打倒 | 未定 |
| 刘小石 | 党委委员、土建系总支书记、副主任 | 打倒 | 打倒 |
| 何介人 | 党委委员、教务处副处长、总支副书记 | 打倒 | 打倒 |
| 凌瑞骥 | 党委委员、自控系总支书记 | 打倒 | 打倒 |
| 邢家鲤 | 党委委员、教务处总支书记、副处长 | 打倒 | 打倒 |
| 李思问 | 党委委员、行政处总支书记、副处长 | 打倒 | 不打到 |
| 张慕萍 | 党委委员、团委书记 | 打倒 | 不打到 |
| 李麟漠 | 党委委员、冶金系副主任 | 打倒 | —— |

在各部、处和各系中

| 姓名 | 职务 | 团派 | 414 |
|-----|------------|--------|--------|
| 李康 | 教务处副处长、副书记 | 打倒 | 不不倒 |
| 罗征启 | 党委宣传部第三副部长 | 打倒 | 不不倒 |
| 谭浩强 | 团委副书记 | 打倒 | 不不倒 |
| 谢祖培 | 校医院院长 | 打倒 | —— |
| 张寿昌 | 校医院副院长 | 打倒 | 不不倒 |
| 金希武 | 机械系主任、总支委员 | 打倒(学术) | 打倒(学术) |
| 李西山 | 冶金系主任、总支委员 | 打倒(学术) | 打倒(学术) |
| 梁思成 | 土建系主任 | 打倒 | 打倒(学术) |
| 陶保楷 | 土建系副主任 | 打倒(学术) | —— |

| | | | |
|-----|--------------------------|--------|----|
| 汪坦 | 土建系副主任 | 打倒(学术) | —— |
| 章名涛 | 电机系主任 | 打倒(学术) | —— |
| 黄眉 | 电机系副主任 | 打倒(学术) | —— |
| 邵斌 | 原数力系总支副书记、党办副主任、蒋的 秘书 | 打倒 | 打倒 |
| 陈德向 | 曾任数力系总支副书记 | —— | 打倒 |

注：“——”不清楚，没有明确结论；

“学术”表示是从反动学术权威的角度打倒的；

团派共打倒 33 名，包括反动学术权威 6 名；

414 共打倒 19 名，反动学术权威 4 名。（不包括党外反动学术权威）

2. 双方分歧的主要对象：

吕应中、罗征启、谭浩强、李恩元、张慕萍、李思问。

团派：

- (1) 这些人是蒋南翔的全套人马，有管党团组织的，有负责宣传的，有主持科研教育的，有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些人上台就是资本主义复辟。
- (2) “旧清华本来就是高教战线上的一块黑样板，200 号和吕应中又是蒋南翔的黑样板。200 号的方向和吕应中的道路集中地反映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剥削阶级教育制度的灵魂，因此要不要批判 200 号的方向和吕应中的道路，这是革与保的问题，是原则问题，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

——蒯大富讲话。

吕应中上台，就等于蒋南翔回来，保吕就是保蒋。

- (3) 罗征启是蒋南翔的黑笔杆。是蒋刘集团的重要成员和得力干将。是炮打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的现行反革命。谁要为罗征启平黑我们坚决不答应！

- (4) 谭浩强，蒋南翔的干将，坏干部，上欺中央，下骗群众，是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

414:

- (1) “他们的大节是好的，从他们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看，他们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坚定的，他们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们过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基本上是好的，他们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但是他们对这条路线是有抵制的。……他们对于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觉悟较早，他们与红教联坏头头及其散布的反动观点进行坚决的斗争……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坚决斗争，在高压之下也是坚定不移。”——“千钧棒”、“不怕鬼”
- (2) 吕应中是革命领导干部，200号的成绩是主要的，只是被蒋南翔所利用。团派揪斗和批判吕应中是为了杀一儆百，压制干部和群众的不同意见。
- (3) 罗征启：是一个在革命大批判中立了新功的革命干部，是好同志，完全有条件提拔到负责岗位上去。
- (4) 谭浩强：好干部，对群众进行过三次检查，对红教联进行了坚决斗争。他还编写了刘邓反对毛泽东思想100例，受到中央文革的好评。还写了揭发蒋南翔罪行100例。
- 他们对自己的错误能够认账。对刘邓蒋的路线能划清界限，有认识，对小将支持爱护，对牛鬼蛇神能坚决斗争，应该发挥他们的作用。

四、怎样对待、解放和使用干部：

| 团派 | 414 |
|--|--|
| 1. 怎样对待犯严重错误的干部： 对待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要进行批判，要彻底检查交代，要进行揭发，要使他们和走资派、反动路线、自己 | 1. 怎样对待犯严重错误的干部： 要“一看二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先找出干部队伍中的关键人物，大胆解放那些被一些人认为是四 |

| | |
|--|--|
| <p>的错误划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即三划一站）；</p> <p>一定要到群众中去；</p> <p>对于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得在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之后才能解放。</p> | <p>类，而实际上不是四类的干部，给他们以适当工作，在运动中认识和改正错误，接受考验和锻炼；</p> <p>要亮真像不亮假像，要自觉亮不亮逼像。</p> <p>反对那种“三类、四类分不清，先按四类处理”的做法；</p> <p>反对闭门“修养”式的检查。</p> |
| <p>1、谁当核心谁掌权：</p> <p>大部分清华干部不是无产阶级当权派，都应当降职使用或者当老百姓，而绝不能掌大权，更不能让走资派混进三结合机构，否则资本主义复辟随时都是可能的。要敢于提拔年轻有为的小干部到领导岗位上，需要破除各种迷信、框框的束缚，要大胆地提拔地位低的左派干部到领导岗位，使他们掌实权，成为核心。</p> <p>——叶志江、姚永宁、宋一龄</p> <p>清华里有没有左派？有的。就是受蒋南翔压制打击的人。我们依靠的是彻底砸烂旧清华的、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干部、工人、学生，我们要依靠的就是韩银山、张修身、李岩、何光有这些好同志。</p> <p>——鲍长康</p> | <p>2、革命小将要勇于让贤，反对大换班：</p> <p>单纯的红卫兵掌握是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要大胆使用干部就必须让贤。这样一批党的好干部，必须让他们在各级领导中发挥核心作用和骨干作用，让他们担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掌好权用好权的重任。敢不敢把大权让给革命的领导干部，这是对红卫兵的一个考验。你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必然把革命政权当成私有财产，把解放干部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p> <p>——“刺刀见红战斗组”</p> <p>清华干部的多数就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掌权！</p> <p>——“干部问题串联会”</p> <p>使用干部就应该使他们有职有权，而不能老是对他们不放心，不相信，不称心，把他们当作陪衬。——”广播台编辑部”</p> |

| | |
|---|---|
| | 不能使干部大换班。 |
| <p>3. 必须解散干部堆： （查动农系“两万五千里”和机械系“红旗飘飘”，原校长办公室“小学生”等前阶段恶意攻击总部，他们基本上是干部堆，通令以上战斗组立即解散，对类似的战斗组必须按上述原则处理，否则严肃处理。 ——二办通令摘抄）</p> <p>“干部堆”必须解散，这个口号好的很，符合大方向。这个方向就是彻底砸烂旧清华修正主义的罪恶统治，就是彻底铲除刘邓黑司令部在全国的反动基础，就是铲除苏修在全世界的流毒与黑根！根本杜绝干群关系的对立，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干部新制度必将诞生，这就是解散干部堆的巨大意义！ ——“第一红岩”、“照妖镜”</p> | <p>3. 对干部必须做阶级分析： “砸烂旧制度必须通过解散干部堆来解决”“解决干部堆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干部与群众的对立”，这是修正主义的观点。他们的错误就在于对干部不做阶级分析。 使干部脱离阶级斗争，脱离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即使解散了干部堆，也不能使干部到群众中来，更不能砸烂旧制度。</p> |
| <p>4. 批干运动： 毛主席说：“全国胜利后，我们干部在群众中受冷落……有些脱离群众了。”林副主席说：“这次大革命是大批判运动，对全国全党是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干部的大批判，就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只有大规模的批干运动，才能揪出坏人，才能冲击广大干部，使之出一身大汗，犯错误的得</p> | <p>4. 要勇于为革命干部平黑：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奋斗目标，绝不是自身的解放，而只能是全人类的解放。革命小将应该理解革命干部被打成黑帮时要求解放的心情，去解放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迫害的干部，为他们平黑。 为干部平黑，恢复本来面目，使一小撮受到孤立和打击； 给他们以平等的权利，给他们以五大</p> |

| | |
|---|--|
| <p>到教育，走到危险边缘的得到改造，才能达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p> | <p>武器。——沈如槐、黄瑞和</p> |
| <p>5. 好得很！</p> <p>回忆 66 年 6-7 月份的情况，当 6 月 10 日蒋南翔是黑帮的消息传到清华的同时，革命群众充满了对黑帮分子的仇恨，充满了对顽固执行蒋南翔黑指示和组织反革命围攻的各级干部的愤怒，特别是看到 10 号还没有一个干部站出来揭发蒋的问题，群众纷纷起来，揪了干部游街，组织各级斗争会，斗了一些干部，我们说这是好得很！</p> <p>毛主席说：“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深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我们革命造反派正是这样做的。</p> <p>这是群众运动的成果。</p> <p>（摘自“哨兵”、“叛逆者一分队”等六个战斗队的大字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欺骗毛主席罪责难逃”）</p> | <p>5. 6 月 9 日—6 月 23 日斗所谓黑帮必须基本否定：</p> <p>清华无产阶级革命派内部存在的两条路线斗争，是 414 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叛逆者一分队”的反动大字报“罪责难逃”就是 414 产生的导火线。</p> <p>6 月 9 日—6 月 23 日这一段群众斗争所谓黑帮，实际上是工作组挑动群众斗干部，以达到保护一小撮的目的。这一段斗争所谓黑帮不是群众运动，必须基本否定！</p> <p>只有在革命路线领导下，才会有真正的革命群众运动。我们之所以要否定，是因为它是在刘邓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统治下，挑动群众斗干部的运动。还是因为这一段不分青红皂白、不分敌我，把矛头指向了广大干部，而保护了蒋南翔一小撮。</p> <p>“罪责难逃”的大字报引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完全是颠倒了是非。毛主席歌颂的游街和清华的游街有本质的不同。对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那是敌我矛盾，农民打击的方向全然没错。而清华干部大部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应如此。</p> <p>但是在此阶段，清华真正的群众运动</p> |

| | |
|--|---|
| | <p>还是有的，这就是以蒯大富为首的革命小将向走资派、反动路线所进行的坚决斗争。</p> <p>——“不怕鬼”等四个组织</p> |
| <p>6.上揪下扫，除恶务尽：</p> <p>上揪下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上揪和下扫是两条战线。</p> <p>上揪就是沿着反动路线这条线，揪出清华园的政治扒手和后台老板；下扫就是扫掉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扫掉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p> <p>上海的走资派的存在是离不开他们的社会基础的。这个基础除了老知识分子、地富反坏右，还有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特别是其中的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是他们重要的支柱。我们不能为他们以“群众”、“学生”的面目出现而看不清本质。这一小撮人早已不属于群众的范围，他们是群众的敌人，我们就是要扫，而且要扫除干净！——红教工</p> | <p>6.要揪要害，解放“黑帮”：</p> <p>毛主席教导我们分清敌、我、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们要集中力量，揪住要害，把矛头对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走资派、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是在6-7月份在反动路线统治下，大批党政干部都被打成“黑帮”，对他们实行专政，强迫劳动。根据统计：各系劳改有308名，校行干部79名，党委各部干部劳改44名，全校共劳改431名。提议解放我校所有原当权派，因为除蒋极少数大家认为已定性外，绝大多数没有定性。暂时的大解放有利于打活老虎，锻炼人。如果他们有人在群众中耍花招，可能会出现反复，但我们坚信用毛泽东武装起的广大群众会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的，其结果他们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加速了他们暴露和灭亡。实际上真正的黑帮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解放，而我们却会受到教育和锻炼！</p> <p>——“揪要害战斗组”</p> <p>基层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在初步检查</p> |

| | |
|--|---|
| | <p>后，可以“下楼”，给以四大武器，在运动中继续审查，后期定案。</p> <p>——“向党负责”</p> |
|--|---|

五、是谁用 50 天包庇 17 年？

团派

1. 江青同志说不要用 50 天包庇 17 年，而他们（指 414）特别用修正主义的手法，篡改江青同志的讲话。他们怎么提的呢？他们说不要用 50 天来否定 17 年。你们听听他们那篇“闪光”的文章就可以知道了……什么叫否定 17 年呢？否定 17 年就是否定 17 年的反革命黑线。他们怕否定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把“50 天包庇 17 年”阉割成“50 天否定 17 年”，实际上就是要包庇 17 年，要害就在这儿。
2. 《516 通知》说的很清楚，当前我们的目标主要是整一小撮走资派，而他们来了两小撮，还有一小撮地富反坏右。把地富反坏右给隔离开来了。……地富反坏右跟走资派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我们斗争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就是一小撮。而他们狂叫：我们就要抓两小撮。结果在学校打击了一大片。把一批批走资派拉进了革命队伍，搅乱了阶级阵线。——鲍长康

教育界，旧清华中是新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专政，在旧清华则是新的为主。不管是新还是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蒋南翔实行的资产阶级专政中主要是起“参谋”与“执行”的双重作用。其中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自然不能低估，低估了这种作用是错误的，这是因为他们：（1）大多数有较高的一套资产阶级办学经验；（2）大多位居上层，或为名流，有相当的政治地位与发言权。但他们也有一定弱点：（1）人数少，尤其是新系与基层单位；（2）尽管蒋南翔一再给他们贴金，但经过 17 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从他们的“学术”到思想作风的真面目在广大群众中看得比较清，已经比较臭，市场不大，威信也不怎么高了；（3）在政治贩卖修正主义的本领不高明，许多人还不能借着党的名义来招摇撞骗。相比之下，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这些缺点……他们有政治资本，有权威，许多事情只有通过他们才能办理，比起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他们是实力派。

——“09 险峰”《浅谈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包庇走资派，包庇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大翻个，反对彻底砸烂旧清华，就是包庇 17 年，包庇 17 年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414

1. 怎样认识 50 天和 17 年？

“我们从来认为，50 天的反动路线是 17 年的反动路线的继续和发展。50 天的斗争是 17 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绝不能隔断历史。50 天和 17 年的关系是辩证的关系。由于 17 年也要一分为二，因此，有的人是利用 50 天包庇 17 年，包庇 17 年的反动路线。也有人是利用 50 天否定 17 年，否定 17 年的成绩，否定 17 年的毛主席革命路线。当然，有包庇必有否定，包庇 17 年的反动路线，必然否定 17 年的革命路线，二者是一致的。我们坚定地认为，资产阶级分子绝不会因为他在 50 天内的造反而变成“左派”；而革命的干部也绝不会因为他在 50 天内犯了错误而变成“右派”。

（摘自“不怕鬼”、“刺刀见红”、“战地黄花”、“千钧棒”、“云水怒”的文章《闪光的东西不一定是金子》）

2. 是谁包庇 17 年的反动路线：

- (1) 团派提出的“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论，提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老教授更危险，而老教授则是有职无权，有鬼无害，就是全盘否定广大干部 17 年来工作中的成绩，就是露骨地包庇这些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露骨地包庇 17 年的刘邓路线！
- (2) 去年那些“大翻个儿派”在他们堂堂的井冈山报上登载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所谓招生广告。在他们的草稿里，一条是“地主和资产阶级又应有所区别，因为资产阶级还不是一个被专政的阶级。”另一条是“各级按比例招生”，“以后招生阶级比例按各阶级人口比例分配，也就是说，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等敌对阶级可按 5% 这个比例。”这样露骨的阶级平等，恐怕连蒋南翔也不敢公开提出来。同志们看一看，“大翻个派”的“彻底砸烂”，原来是这样的砸法，这哪里是砸旧世界，明明是包庇旧世界！

- (3) 大翻个儿们还出了一个奇怪的论调，他们要批判过去毕业分配工作中的谭氏路线。真是活见鬼，众所周知，过去毕业分配中修正主义的路线集中表现在重在表现，在于彭氏路线，哪里有什么谭式路线，谭氏路线是50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集中表现。大翻个派批判50天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把过去毕业分配中修正主义的彭氏路线改为谭氏路线，这不是用50天包庇17年又是什么？

3. 是谁否定17年的革命路线：

- (1) “基层干部是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三类干部比四类干部更危险”，“200元的教授比40元的党员更革命”，“彻底砸烂干部堆”，“干部都是为法西斯卖力”，这些都为大翻个儿们稀里糊涂接受下来！我们的理论与实践，不正是用50来否定17年吗？“红教联”的头头，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陶德坚之流，继续刘邓路线的衣钵，还提出什么“上揪下扫除恶务尽”及上述种种反动谬论。……然而这样一个反动的家伙竟然被称为“好同志”，“坚定的左派”，并且受到重用。我们指出：包庇陶德坚，就是否定17年！
- (2) 从去年三月起，大翻个儿人们就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到7月份武汉事件之后，关帝庙的香火兴旺，林杰之流公开号召抓“军内一小撮”，这时又传出了王八七在天安门上对某人的谈话，说什么某三八军区司令员“不听毛主席的话”。事实很清楚，就是关王利用大翻个派所受的“极左”思潮的影响，鼓励他们去抓“军内一小撮”，于是“武化革命”论出笼了，“先进的南方，落后的北方”出笼了，“全国处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准备上山打游击”的谬论出笼了……他们利用解放军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抓“军内一小撮”，“武化革命”论，不是否定解放军又是否定什么？否定解放军就是从根本上否定17年！
- (3) 蒯某的”2.4”讲话最坦率、最露骨地说明了这个思想（指蒯氏路线），这个错误的讲话把所谓”蒯派”比作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把八八派比作贫下中农，还算是依靠对象，而原来的保守派被认为是中农，成为团结对象，至于什么”唐伟”之流，则是挂红布条的

小地主，竟成了专政的对象，镇压的对象！我们当时就指出这个讲话是大毒草，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这个讲话给”痞子掌权论”提供了理论基础，”蒯氏路线”和”痞子掌权”不正是以50天否定17年吗？■

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2008年9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老年的同人刊物。《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记忆》宗旨，成为本刊会员，遵守本刊规定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宗旨，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刊训。遵奉众生平等，百家争鸣之精神，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本刊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方惜辰，信箱：jiyi.bjb@gmail.com

林洛，信箱：lereve1860@gmail.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